

炎黄春秋

第 **2** 期
2008年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张申府：“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还纳吉以清白

目 录

亲历记

- 1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田纪云
- 5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安振英
- 8 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于峰华

一家言

- 13 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整理)
- 15 现代民主的两面观……………赵鼎新

沉思录

- 22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崔卫平
- 28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穆广仁

求实篇

- 30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徐 焰

人物志

- 35 张申府：“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王贵胜
- 40 “两弹”元勋朱光亚……………王建柱
- 44 追忆章士钊先生……………周相唐
- 49 “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张 磊

往事录

- 52 任仲夷同志的一幅珍贵墨宝……………杨 慎
- 53 阎锡山的最后岁月……………黄禹康

海外事

- 57 还纳吉以清白……………侯凤菁

古今谈

- 63 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尹振环
- 69 清王朝的覆灭及其教训……………肖建生 肖羽西

文摘苑

- 75 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等三篇……………邓 海 等

编读窗

- 79 读者来信摘登(六则)……………宫时中 等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qikan.com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

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口,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办特区的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共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6月6日、6月9日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1979年4月,中央派谷牧同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到广东、福建作了实地考察。经过上下反复酝酿、研究,1979年7月,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说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经济发展计划以省为主制订,原由中央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除铁路、邮电、民航、银行、军工生产和国防科研外,全部下放省管理。

——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增收部分由省安排用于经济建设。

——扩大外资权限。在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方针指导下,由两省分别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外贸出口收汇,以1978年实际为基数,增收部分上交中央三成,余额留地方使用。

——搞活金融体制。两省可以设立投资公司,吸收侨商和外商投资,自借、自用、自还。

——物资、商业体制运用市场机制,以1978年为基数,保证国家的调入和调出,其余由省灵活统筹安排。

——在劳动工资和物价管理方面,都扩大省级权限。

——关于举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外国厂商投资办厂,实行优惠税率。

1983年我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经济特区的工作由我分管。谷牧同志向我介绍,1979年末,对试办特区多数同志意见趋于一致,但叫什么名字几经周折。开始议论想叫“出口加工区”,但范围似乎窄了点。有人主张叫“自由贸易区”,问题是“自由”两个字不容易被人接受。正在犯愁的时候,坚持反对办特区的同志针对小平同志所说的“陕甘宁也是特区嘛”批评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很快传到广东。广东的领导人脑子反应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小平同志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

1980年3月,中央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决定: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和市场调节,在建设上以吸引外资、侨资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特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灵活的机制。后来小平同志把特区的作用概括为四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图为4月6日,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王震等与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合影。

个窗口：“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在中国创办经济特区，举步十分艰难。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坚决反对的同志、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不少，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十分坚定，亲自视察，明确表示支持广东、福建先走一步，为我国发展经济“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小平同志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与支持。1984年他视察深圳等三个特区，对特区的建设成就表示满意，并给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对的。”从此对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淡化。深圳也从初期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三来一补”企业，向高新技术发展，相继出现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和现代化企业，真正起到了对外窗口的作用，吸收了国际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为内地培养输送一批批人才，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确实起了“四个窗口”的作用。

1987年，邓小平同志说，“我现在可以放胆

地说，我们建立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党中央、国务院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建省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随后，国务院批准下达和公布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要”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予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又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

1987年，赵紫阳同志在担任总理和代理总书记期间，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

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赵紫阳同志在此对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依据和方针政策措施作了详细论证。他认为,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为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他提出的战略设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是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裕,素质较高,费用也低,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区的情况。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也是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

(二) 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主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三) 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

销售网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为实施上述战略设想,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广东、福建两省,过去九年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成绩显著,经济搞得较活,发展速度很快。中央决定,两省要继续先行一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扩大开放,对金融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房地产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及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海南岛当时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建省后将确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当时的经济特区更放宽、更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二是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85年初,已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9个市49个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两片由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新增两市46县。赵紫阳提出,要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开放区扩大到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



1983年12月1日,田纪云在深圳渔民村调研

县,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区。这样一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将形成有 32 万平方公里土地,1 亿 6 千万人口的连片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此后,国务院批准,为加强和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又陆续开放一批沿边城市,享受开放城市的待遇,如满洲里、绥芬河、晖春、丹东和广西东兴、云南畹町等。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给经济开放区的政策主要是:5 年内进口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免征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八折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地区的开放,国家基本不增加财政、信贷、外汇负担。

三是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当时我国外贸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没有触动长期存在的外贸企业吃中央“大锅饭”的弊端,没有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这是我国外贸体制一次大的带有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改革。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话,就是“统一对外”。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要把责、权、利统一起来,促进工贸、技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使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做,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专门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改革的方向对头,目标明确,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这项改革搞好。

四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当时的重点是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

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赵紫阳同志提出的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 年 1 月 23 日,小平同志在赵紫阳报送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

1988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3 月 4 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执行沿海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3 月 18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 140 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人口增加到 1 亿 6。1988 年 9 月 12 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不仅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全面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中西部的的发展也起了强劲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责任编辑 杜晋 吴思)

1961—1962:

河北省甄别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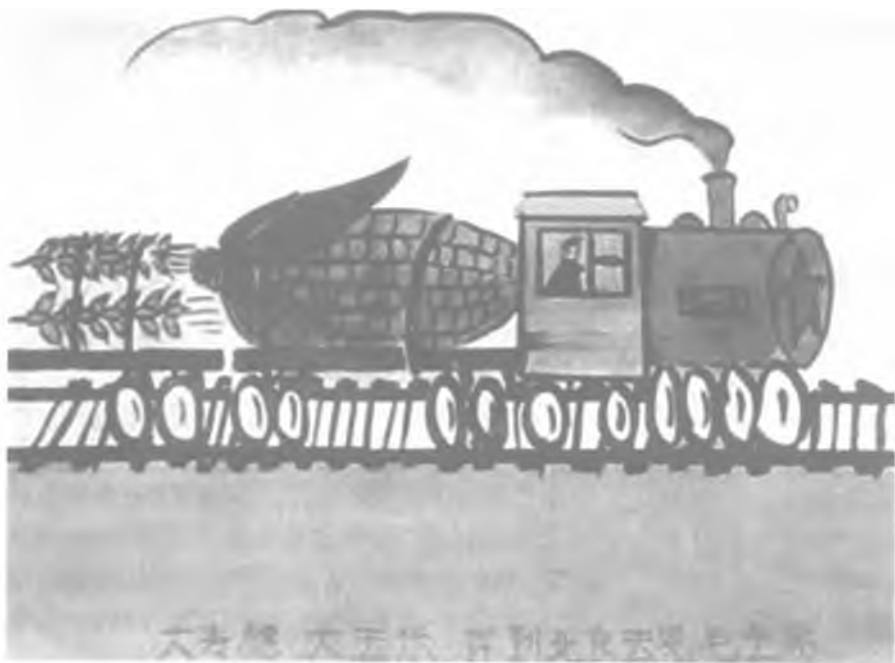
安振英

1958年“大跃进”，河北省和全国一样，“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像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燃了一把火，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言路更加闭塞，“五风”继续泛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冬，只得以下“低指标，瓜菜代”度日，靠晒太阳休养生息，还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形势，1960年冬和1961年春，全省的工作重点是以纠正“五风”和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全省确定霸县、宁晋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指导和协助县、社党委进行工作。我参加了霸县工作组，所见所闻，荒凉凄惨，触目惊心。尤其以稻田移栽放卫星出了名的胜芳公社，群众浮肿、妇女闭经和非正常死亡都很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议论要给公社党委书记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在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同志找我的一次谈话时，对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痛心；又说明“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后果会更严重。”经查阅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边做的更严重。更何况，胜芳的稻田移栽高产卫星，省委负责同志大多去参观过；中央有的负责同志参观时，站在移栽后的稻谷上拍照留念。县委有规划；领导同志的参观，都是来鼓劲，喝彩和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过多地追究下边执行者的责任了。这种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并非个别现象，然而对错误的认识却有个痛苦的过程：先说是“九

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说是“一个指头胖了点”；先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直到1962年1月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大讨论，才认识到“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

认识到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开端。随着1961年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的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央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和省委常委、宣传部朱子强为副组长并吸收有省监委、组织部和农村工作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办事机构的甄别平反工作办公室设在省监委，工作人员以监委为主，组织部、宣传部和办公厅都有同志参加。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旗帜鲜明、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到1962年夏基本上完成了全省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的脱产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在1962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推动下，经过逐步酝酿，在4月6日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做出决定，为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和原张家口市委书记葛启等同志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做了检讨，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

甄别平反工作是在突破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取得进展的。1961年七八月间，先是在秦皇岛搞了原市委书记常立木的甄别平反试点，然后全面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

推开的。在工作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个思想转弯的过程，有些在位的领导干部还考虑自己的位子问题，这就需要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几乎是逢会必讲：对于经过甄别确实是搞错了的就是要彻底平反，不抓辫子，不留尾巴；要诚心诚意地向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没有意见了为止。还多次批评“抓不住辫子揪头发，揪不住头发挠头皮”的问题。

就全省来讲，甄别平反工作的焦点在唐山。这里集中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原市委书记刘汉生和时任市委书记杨远、市长白芸的问题，市委内部也有分歧，隔阂很深，当地党委难以解决。为了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省委派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候补书记裴仰山、常委李子光率领的工作组，领导召开了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刘子厚也亲赴唐山听取汇报和指导工作。会议持续了20多天，表面上甄别平反问题是解决了，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起来，为后来的所谓唐山问题留下阴影。

我作为省监委的中层干部，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甄别平反工作的全过程，一开始就参加了甄别平反工作的试点；工作展开后在甄别平反办公室负责案件审理和资料工作；最后起草了

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我以极大的同情起草了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和原张家口市委书记葛启的甄别平反报告和决定。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受处分后下放到邯郸钢厂任副厂长，在我奉命征求他对甄别平反的意见时，他作为行政八级的高级干部，用一天时间向我详细述说了反他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程，谈到伤心处几次掉下了眼泪，我的眼睛也跟着湿润了。当裴仰山问我谈得怎么样时，我说：谈得很平和，他没有像有人说的那么大脾气，谈到伤心处还几次掉下了眼

泪。裴深表同情地说：“伤感情太深了！”到4月6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几位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地、市委书记平反时，刘汉生却真的来了脾气。他没有住省委为他安排的河北宾馆，开会前找不到人就向我打听，我从邯钢驻天津办事处（当时河北省委驻天津）的地下室找到他，才由省委一位副秘书长乘车接他到会。

我之所以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甄别平反工作，除开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性，还由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处在努力紧跟也跟不上的状态：在合作化高潮中对号入座，检讨了“小脚女人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做检查，挨批判十个月，才由领导保护过关，幸免坠入右派深渊；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说些跟不上形势的话，常被指责为“不接受历史教训”。现在搞甄别平反就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干着特别顺心。始料莫及的是，这样得民心顺心意的工作竟出现了惊人的反复。在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大讲特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评了翻案风以后，省委少数领导同志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省委内部的分歧随之凸显了出来。我能接触和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在批翻案风的形势下，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出现了严重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起来。在省委十三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

笼统地讲了“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收了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我起草的甄别平反工作总结，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出于为难，不能签发，让放一放再说，虽经中央监委多次催办，说明全国就剩下河北省没有报总结了，再不上报将影响全国甄别平反工作的总结。结果还是无法上报。河北省的甄别平反成了一项没有正式总结的工作。

(二) 在对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声音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就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除葛启地委书记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葛启经历的处分、平反，再处分，再平反的反复，大致情况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省委八次全会《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把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合理意见，说是“猖狂地攻击”、“恶毒地诬蔑”，“这种攻击和社会敌对势力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逆流相配合，它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决议》对葛启错误的根源说：“葛启同志出身于富农家庭，是在抗日战争中抱着民主革命的观点入党的。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其特点是代表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调子之高，帽子之大，葛启被推向了敌我问题的边缘。1962年4月6日，河北省委《关于整风反右运动中对葛启同志所做处理的甄别决定》说：“葛启同志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供给制、集体福利、集体事业问题上，在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上，在工农业生产问题上，对于实际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问题提出的意见，总的来说是对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把葛启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给以撤销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处分，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在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之后，1964年的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折腾的还是这类事情，葛启再次被撤职，还株连了一批好同志。从此，沉冤16年，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才为葛启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葛启同志的“新账老账一起算”，造成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伤未平又添新疤，使20年的大好年华，消耗在翻来覆去的折腾之中。

(三) 在省委领导核心“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的人。在甄别平反工作中，对工作挑剔指责；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时，对工作的估价争论不休；甄别平反工作结束不久，就以所谓唐山问题大做文章。唐山问题本来是省委内部围绕着“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的分歧，却指责身为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裴仰山，“唐山问题实质上是对子厚（阎）达开同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以唐山做靶子就是了。”进而上升到裴仰山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更罗织罪名，省监委有个反省委的“自由市场”，“对这个‘自由市场’裴仰山是知道的，也不向省委汇报，任凭自由泛滥。”他还制造，还利用。”还指名道姓的批评了省监委的几名同志（所谓“自由市场”，是省委对一个案件做了错误的处理。监委几个知情的同志[包括我本人]对被错误处分的同志表示过同情，骂过被漏掉的坏分子。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已经平反，被漏过的坏分子已开除党籍和追究刑事责任）。就凭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决定对省监委“拆庙搬神”，“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监委的工作由一信（省委）副秘书长来管。”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对裴仰山进行批判；会后派一名省委常委在监委坐镇进一步深批。这一系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专横跋扈的行径，使裴仰山同志沉冤十几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

甄别平反工作旨在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左”的错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样天大的好事，竟遭受如此严重的曲折和磨难，酿成河北省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悲剧。究其根源，还是那个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左”字在作怪。为了“左”，昨天的“低指标、瓜菜代”和非正常死亡，伤疤未愈就忘疼；在省委全会

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

于峰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两弹试验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提高了我国的国威军威。

两弹试验成功，固然与被称为“两弹元勋”的科学家的奋斗密不可分，但，两弹毕竟是大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倾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所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心血。

当时我所在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一三公司）就是为两弹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核工业的规划，23公司于1958年在兰州成立。在此之前，公司的一部分职工曾参加过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重点建成了重水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从而为我国原子能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3公司成立后，下设五个工程处。公司率领

主力第三、第五工程处和一个机械加工厂赴戈壁滩建设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是我国最大的原子城。建厂初期，困难重重。没有房子住，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水喝，用车从玉门镇拉。粮食和蔬菜全部从外地运进。每逢冬春季节，沙尘暴接二连三，沙子打在人脸，像刀割一般疼痛。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人浮肿，几乎到了断粮的地步。就在这种艰难困苦面前，23公司职工以顽强的毅力和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大自然争斗，用最快的速度，最新的技术，最好的质量建成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促使我国原子弹、氢弹提前试验成功。

以后，23公司开赴西南建设大三线，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就是23公司进入大三线后的第一个杰作。改革开放后，随着向经济建设转移，23公司先后建成了上海金山化工厂，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辽阳、泉州、安庆等大型石化厂。当时，这

上庄严地“向你们道一辈子歉”竟成了儿戏；专横跋扈起来竟致破坏党章规定。人们通常把“大跃进”、反右倾运动看作建国以来我们党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失误的顶点。然而，旨在纠正“左”的错误的甄别平反工作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非标准还是取决于领导者头脑发热的程度；工作稍不随领导者的心意，还是戴帽子，打棍子；党内还是“左”字的一言堂。十分惋惜的是，当时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已先后做古了。若有他们健在，对河北省党的这段历史会说得更清楚。对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会讲得更加透彻。

作为河北省甄别平反工作的回忆与思考，本该到此为止了；可是想到“文化大革命”，又觉得

言犹未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河北省这场内乱一开始，就把裴仰山作为“老右派”抛了出来，还为监委刮翻案风定了调子。在泰山压顶的气势下，围绕着刮翻案风和“背着省委反省委”等问题，在省监委大搞起以裴仰山为首的“反党集团”，把省监委折腾了个底儿朝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等同志，自然也在劫难逃，惨遭折磨。不难看出，河北省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中的悲剧的继续和发展。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些厂的设备全由国外进口。与此同时,23公司又承担了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连云港核电站及宇航员训练中心等高精尖工程项目的建设。从以上工程项目可以看出,23公司是一个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国家队。

23公司焊接各类不锈钢、高合金钢、特种钢;吊装大型设备;调试安装自动化设备的技术,迄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职工素质高,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型安装公司,在“文革”中,却遭遇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劫难。

1967年元月份,清华大学的一帮学生从北京带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汹汹烈火。那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猛。先是揪斗走资派,接着便是夺权,再下来两派相互攻击。最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的武斗。在周恩来总理的苦苦相劝下,两派才联合起来。然而,好景不长,清理阶级队伍又马上开始了。各单位纷纷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第一批专政的对象是各单位原先的领导。他们在文革初期,都称作“走资派”、“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两派互斗的一年多中,他们算是逍遥了一阵子。此时,他们的罪名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坏分子云云。被抓的人,统称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牛棚”。刚开始,人们看到关进“牛棚”的“老牛”还感到好奇,纷纷围观。可时日不久,“牛棚”中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老牛”不仅限于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有。群专大会不时召开,每星期总有一、二次。此时,人们普遍感到害怕了。过了一段时间,军代表在群专大会上讲:“现在,有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当时我所在的第三工程处是1500多人,担负着我国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虽说主体工程已完工,但尚有少量扫尾工程。同时,与之配套的后处理厂418工程也在建设之中。要按10%的比例抓,就得抓150多人,肯定会影响工程进度。当时,人们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因为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一到召开群专大会,一个个如丧考妣,耷拉着头,哭丧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着沉

重的步子向大礼堂(平时的大食堂)蹒跚走去。当依次在大礼堂席地而坐后,神经一下都绷紧了,连粗气都不敢喘。一千多人的会场,连掉下针的声音都能听到。大会宣布开始后,群众(专政)总指挥用那老鹰寻猎物一般的眼光向会场一扫,说:“将——”(将字拖得很长)这时人们的心已提到了喉咙眼。“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上来!”此时就有几个如狼似虎的群专队员马上扑过去,将被抓的人按倒,先从胸前摘去毛主席像章,再从其手中接过语录本,由两人把胳膊往后一扭坐上“土飞机”,再由一人上去把头发一揪,就押上主席台。接着就是“打倒×××,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

经过这一次次场面后,人们也开始学乖了。每次召开群专会之前,先把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和语录本一起拿在手中,很多人剃去了长发,不管冷热都穿上老皮袄,以免被抓后皮肉受苦。

抓了几次一般职工之后,又从群专队员中开刀了。昨天,你可能还拿着红缨枪抓人,今天,你自己又成了被抓的对象。这时,人们的胆子都被吓破了。群专队员原是军代表从所谓好同志中挑选出来的,现在还有谁是好人?

我当时也是群专队员,明知自己无一点问题,但心中就是有一种说不清的害怕。一开群专会,吓得浑身打颤,腿肚子发软。要不是拿着那杆红缨枪当拐棍拄着,真有站不住的感觉。

“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老牛”已超过了150多人,按军代表最初的说法,该抓的比例数已超额完成了。但,此时他们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

天哪!这到底怎么了?我们这是绝密厂,凡是进入二机部的职工,在入厂前都经过了严格政审和反复调查,连祖宗三代都查了个遍,并且当时我们的年龄都不大,据后来的资料披露,我们造“两弹”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大多数人是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戴着红领巾、团徽长大的,迈出校门就进了厂门。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傅大多数是从部队转业的,绝大多数是党员。有的班组,全是党员,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班长就是党小组长。领导干部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中有的是老八路,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清理阶级队伍时，批斗历史反革命的场面

援朝战争。从整体看，都是些苗正根红的人。“两弹”试验成功后，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可我们那些亲自参加过制造“两弹”的人，却分享不到那喜悦，甚至人人自危，连头都抬不起。那时，每天晚上都召开“斗私批修”会。在那会上，除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积极主动求得别人的帮助外，散会后，还要和自己的同事个别谈心，让他帮着回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错话。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回忆从记事起，自己有过什么过失。由于长期失眠，精神恍惚，吃饭不香，上班无劲。兄弟单位 22 公司二处的一名工人因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在离我们食堂不远处的一个水泥库中上吊自杀了。

自从派性升级后，于 1967 年 6 月 29 日和 8 月 23 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特别是“8·23”武斗，双方都死了人。武斗固然害怕，但，只要你不参加，或者躲开，总不至于受到伤害。而此时的精神压力，却能把人压得趴下。

有一天，在群专会上，军代表说，“8·23”武斗的第二天，苏修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从这一点说明，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

楚。

于是，一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23 公司成立之初，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有很多技术人员赴苏学习、进修过，部分工人也在苏联受过培训。此外，公司还有几名苏联留过学的技术人员。如此一来，这些在苏联吃过洋面包的人成了首先怀疑的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自然也不会放过。

群专会还在继续开，人还在继续抓。被抓人的“罪名”也越来越新鲜。我们的专业是无损探伤，因接触 X 射线和 γ 射线，每月享有

15 元的保健费。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发话，奖金和保健费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从此，15 元的保健费降到了 7.08 元。有一天，也是该当有事，我的一位同事叫了几个人，拿了卫生部 50 年代下发的文件，到安技科，说，根据文件精神，保健费是保证职工身体健康的。随便降低保健费无道理。这情况反映后，不知是谁做的主，保健费又恢复到了 15 元。没过几天，我的那位同事突然被抓，罪名是“资产阶级经济主义黑干将”。此时，被抓的人，已达到了 170 多人，占职工总数的 11% 以上。

每次召开群专会，先是抓人，后是批判“老牛”。批判次数最多的“老牛”有三个。一是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李延林；二是公司副经理诸明翰；三是一名姓徐的工程师。

李延林，辽宁人氏，30 年代毕业于奉天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为我党和苏联红军搜集日本人的情报。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和几个进步同学去延安。走到唐山一带，被日军抓获。幸好看管他们的伪军连长是李延林的堂哥，堂哥千方百计把他从虎口中营救出来，并画了一张去延安的地图让他带

着上路。李延林是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到延安后一直在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相识。解放后，他晋升为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1956年，他率领一个安装工程处赴北京参加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我国首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他的领导下顺利建成。期间，他解决了无数疑难技术问题，被周总理称赞为红色原子能专家。就是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专家，此时却被打成了“叛徒”、“特务”。每次批斗他，都要坐一次“土飞机”。为了坐“土飞机”时的方便，军代表授意将他的头发剃去，只留头顶一小撮。这一小撮头发被揪来采去，头皮与头骨脱了层，头顶肿得像盖了一只碗。后来，有人担心长此下去会出人命，头顶的那撮头发才被剃去。

诸明翰，湖北沔阳人，解放前大学毕业，上世纪50年代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处长。按他的说法，管着百十来号工程师。我国核工业启动后，调23公司任副经理。他此时的罪名是“三反分子”，“三反分子”的由来是这样的：1963年，23公司在上海招收了一批学徒工。因当时原子城的建设尚未全面展开，于是，将他们送到上海各大工厂学习。1964年，工程大上时，全部入厂。这些年轻人，从小在大城市长大，未出过远门，对外面的世事感到陌生和好奇。他们刚来到大西北，看见毛驴就说：“哎呀，大西北的兔子真大。”他们看见食堂的苞谷面发糕就成盆子买。别人笑他们，他们却说：“阿拉上海买蛋糕都凭票，这里的蛋糕随便买，不多买才傻哩。”这两件事当成了笑话，广为流传。1966年年初，诸明翰给职工工作了一次学习毛主席《矛盾论》的辅导报告。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他举了驴子和兔子的矛盾，蛋糕和发糕的矛盾这两个例子。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说是诸明翰不讲阶级和阶级矛盾，却大讲特讲驴子和兔子的矛盾，蛋糕和发糕的矛盾，这就是典型的三反分子。还有一件事也成了诸明翰的一大罪状。1966年，根据中央发展氢弹的部署，801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在工程总结大会上，诸明翰讲，同志们呀，我们的工作干得不错，801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中央给我们拨了一大笔奖金，平均每人一百多元。其实，由于后来文化大革

命的原因，那奖金职工并未拿到手。此时，军代表却说他宣扬了刘少奇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在批判诸明翰时，打没有少挨。有一次，他的腿被群专队员打伤，鲜血直流，但批判会并未停止。

徐工程师，江南人，解放初大学毕业，学机械专业，调入二机部前，曾是中国援助越南的专家。被专政后，他的罪名是“坏分子”。据军代表讲，徐工程师在越南当专家期间，将一台机器拆开没有装上，给中国人丢了脸，破坏了中越关系。因此是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同样，他在专政批斗期间，也没有少挨打。

群众专政进行了七八个月后，有些人反而想开了，与其提心吊胆过日子，还不如痛痛快快，该干啥就干啥，大不了，就是当一回“老牛”嘛，反正现在“老牛”越来越多了。有了这想法，有人竟斗胆提出要结婚。军代表听说有人要结婚，无话可说，就讲，结婚要“破四旧，立四新”，要举行革命化的婚礼。何谓革命化的婚礼，闻所未闻。第一个结婚的男青年是武汉人，新娘是天水人。在同事的怂恿下，我也去看了一回热闹。原来，革命化的婚礼还是批斗会。只见几个群专队员押着诸明翰进了新房，进去后，按程序，诸明翰先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再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之后，新郎念了一篇批判稿，接着，新娘又念了一篇。念完后，就是“打倒三反分子诸明翰！”的口号声。只见诸明翰自进新房门后，就弯着腰，垂着手，腰弯成了90度，看上去像只动物。他眼中噙着泪水，但未流下来。此时，他也许看到人家结婚，触景生情，想到了受株连的妻子儿女，也许自尊心和人格受到污辱，但又无奈。

就在这一阶段，23公司机械加工厂的“牛棚”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有个叫池殿基的焊工，据说罪行严重，被单独关在一个“牛棚”中。为了预防他自杀，将电灯装在天花板上，并抽去了他的裤带和鞋带。有一天，他说要看报纸学习。群专队员给他拿去了带报夹的几张报纸。晚上夜深人静时，池殿基把报纸从报夹上取下，将报夹吞入口中，然后在地下猛砸，最后，报夹刺破胃而死亡。事情发生后，军代表说，池殿基自绝于人民，是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将其家属和子女遣送老家监督改造。池是黑龙江人，然而，家属及子女并未遣送老家，而是遣送到酒泉祁连山

下的一个贫穷公社——红山公社监督劳动。

1969年,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后,随着落实政策的实施,关在“牛棚”中的“老牛”开始陆续释放。释放时,召开释放大会。会上,军代表先给自己铺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他们说,当时抓是对的,现在放也是对的。他们还是有错误的嘛。希望放回去后,继续“斗私批修”,继续接受群众的监督,继续进行改造。其他人都释放了,只有两个人没有放。一个是公司经理李延林,据说他的问题特别严重,遣送二机部湖北钟祥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另一个是公司副经理诸明翰,据说,他的家庭历史复杂,已不适合在二机部工作,调往贵州一个煤矿工作。

几年以后,有人界定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是“白色恐怖”。然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恐怖,吓破了许多人的胆,伤了许多人的心。1969年年底,23公司的大队人马离开戈壁滩参加大三线建设,有部分人趁此机会调出了23公司,以技术人员、老工人为多。到大三线后,各级党委陆续恢复正常工作。经复查,当时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造成的冤假错案,许多人是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抓的。就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李延林,后经查实,也无问题。李延林后从“五七干校”调往北京,重任中央二机部总工程师。李延林不愧是红色原子能专家,核工业的翘楚。晚年的他,精神矍铄,常年奔波于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为我国的核电工业又立新功。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我当时担任23公司三处焊接队代理党支部书记。那时需要传达的文件较多,其中有一份是有关核工业的。文件中讲,二机部领导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提到二机部在文革中是重灾区,调走的科技人员太多,特别是九院已影响了科研和生产。当时看到这些文字,心中“咯噔”了一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央提出了全国学石油部,国防工业学二机部,不成想,转眼间二机部又成了受迫害的重灾区。当时不管我们23公司受迫害,而是整个二机部都彼此彼此。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批示,做好思想工作,让调离二机部的人员全部调回。后来,不知其他单位返回了多少,据我

所知,23公司无一人回来。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离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已近40个年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那时,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尔今已成两鬓斑白的老人。那次“清理阶级队伍”给人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很多人从反面接受了教训,在以后的岁月中,小心谨慎,惟命是从,瞻前顾后,再没有了当年造“两弹”时的锐气。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军转民,许多人像小脚女人一样不敢往前走,究其原因,尽管与长期封闭有关,但,也不能说与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无关。(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2期目录

书屋讲坛	“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雷 颐 资中筠
说长论短	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个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 ——以胡先 为例	智效民 黄 波
灯下随笔	何谓“民粹主义思潮”? 信任的社会经济学 从尤利西斯的“绳子”到布什的“笼子”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肖雪慧 曹东勃 宋书林 戴 煌
域外传真	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对日本大正民主的思考	赵 刚 袁灿兴
书屋品茗	中国文学的西天 书法艺术与心灵自由 ——关于怀素草书《自叙帖》 阅读杂记	周泽雄 蔡永胜 邓 贞
前言后语	自由的歧义与条件 ——《自由二十讲》序言 《丁文江先生学行录》前言	何怀宏 欧阳哲生
思史佚篇	封建政治家的宿命 ——从吕夷简看官僚体制的“内耗” 岳飞、于谦两少保冤狱及其平反 《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	雷池月 鸣 弓 晏建怀
其人其事	军事巨人与道德侏儒 ——冷评拿破仑	许 述 夏言玫
编读往来	关于邵飘萍及其夫人汤修慧的一二事 此福王非彼福王	散 木 田承军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5.00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 0731-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

姚监复 整理



杜润生(徐庆全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

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意义与作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我国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对于建国以后,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结论,抛开了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急于发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和“文革”式浩劫。胡锦涛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深刻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如何认识社会和谐、怎样

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上,我们也发生过严重失误和曲折,教训是很深刻的。”(《求是》2007年1期4页)

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些失误、曲折的认识根源是什么?主要教训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离开了新民主主义论,忘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以下重要论点:“新中国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称为“新式”?因为,新式资本主义社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实质上,特别是在经济制度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仍然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仍然是允许和鼓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七大”也作过精辟的论述。这些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再一次向全世界公布了。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

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新的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页）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经不是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1996年8月北京第1版，第323页）

遗憾的是在以后历史中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犯了“太急了”的毛病。悲剧在于他在1945年批评我们党内同志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指出了由封建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苏联社会革命党成了反革命，而他老人家到了1953年就急急忙忙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从反右反右倾，穷过渡的人民公社化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和谐遭到彻底破坏。这就是产生严重失误和曲折的最深刻教训。

因此，必须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社会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政治结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将处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所清楚地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因此，我们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正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的现实。不要为过去自己被曲解的、激昂情绪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乌托邦口号所束缚，真正与时俱进。

1853年4月2日，恩格斯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有一段精彩的预言，很适用于2007年的中国。恩格斯预言：

“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在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压力下，由于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是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87页）

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首先要肯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承认现在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是处于新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不必再实行向共产主义的跃进的试验，不必当“怪物”或“笨蛋”，而是尊重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和客观规律，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2007年11月19日）

（此文系姚监复根据杜润生同志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 吴思）

现代民主的两面观

赵鼎新

当代世界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和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制度创新。

民主体制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

为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其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低腐败等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因而是民主本身的性质。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下层政治力量能达到较好的整合时(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民主所伴随着的自由及其它因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公共舆论,这会对官员腐败带来限制。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是收视率和订阅读量,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如媒体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缺乏(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难度,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中新闻对官员腐败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是,由于众多复杂原因的限制,这种制约能力也有限。事实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腐败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

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等非民主的手段来达到的,虽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制约在其中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中(包括了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更复杂。一方面,在实行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一般不会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大规模灾难。另一方面,至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了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成功案例。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加上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从另一面看,这和平是由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美国确立在西方霸主地位而带来的。所谓的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从这一角度看就像是在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十分复杂。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战争从来不断。巴勒斯坦在民选出哈马斯政权后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有了加剧。至今为止,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度。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于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在两党及其大多数百姓的大力支持下,轻易地陷入了伊拉克战争而难以自拔。但是,现代民主

国家中的统治者应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和持续地陷入一场希特勒式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主动侵略他国后如果能迅速取得胜利，他们的百姓大多数会支持这一场战争。但是当他们的军队仗打得给本国人民和财产带来持续巨大伤害时，他们的百姓会通过选票制止这场战争。

如果民主不能简单地带来以上所提及的这些重要的社会公共物品，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在哪儿呢？笔者以为，现代民主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现代民主下，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并大大提高了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这些都导致了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弱和政府对于百姓直接控制能力的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起来的利维坦（国家），怎么制约国家权力就成了一个主要问题。相应，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观/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观/情感合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来自于它的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一定程序下的竞争性选举，这就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时源自于多个方面，不同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却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是竞争性的选举，而目前中国是经济发展和道

德表率)。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来得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没有可能。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常被称之为克里斯玛权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其体现的特定使命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和价值观/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一个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寄于绩效时，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率。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在一定程序和规则下的选举就成了国家核心合法性的一个最为稳定的基础。与其它合法性基础相比，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台湾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示威抗议下，在民调支持率跌到仅十几个百分点时，仍然能轻轻松松地挺了过来。在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竞争选举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也得当完了这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大大减低了百姓对官员的压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现不良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在一些议会制民主国家里，政府在有多数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就得宣布解散，

反对力量对执政者的影响因此就比较大。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政治运作而不是政府的执政表现而决定的)。但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只要总统没有明显违法并被铁证如山地查获,制度框架下的弹劾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把政体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政府的垮台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民众很难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这个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竞争选举合法性给一个国家中的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但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从而构成了民主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这是因为:1)言论和结社自由给社会中各种思想和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交流和竞争会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更深入的理解。去年我在北京打出租车的时候曾有过以下这么一个经历:该车司机在驾驶中大骂现政府,并扬言如毛泽东还在的话,他将跟毛泽东上山打游击来推翻现政权。我以为该司机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几次询问后才知道他刚在四环路外买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对买房要付二十年月供这一点感到极其不满。那司机说:“先生您想一想,二十年的月供,二十年啊!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银行就会把我的房子收走。什么世道!这世道不造反还咋的?”直到下车时我才告诉该司机我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任教,但是以我的经济能力在美国买房将不得不支付更长时间的月供。在目前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处工作或阶层的人在社会上所做的付出远远大于其收益。虽然该司机十分极端,类似情绪在中国却普遍。在各种思想和利益没有交流和竞争的情况下人们缺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2)言论和结社自由促进了社会上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场合下,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方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任

何社会运动都有对此进行抵制的反运动。它们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可能,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中的种种不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家中,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限制,他们同时也享受着英雄和社会导师的荣誉,并有着很多听众;而这些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后,这些社会导师及其声音在社会上马上就会被弱化。他们的话没人听了,他们的自我感觉再也没有像在威权时代那么好了。3)出于众多原因,在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府在上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对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会显著地下降。问题是新选上来的执政者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也不见得能干得更好,这一因素和民主的其它性质相结合,长期以往就会造成百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他们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见得一定更好,这是对民主选举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这种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会选举投票率一直很低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第三,由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已是民选政府,民主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际合法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里,一个被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虽然背后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包装下的利益争夺。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国际上认为是民主国家,国际社会就不得不对该国家在国内的政策和国际立场表示更大的尊重。总之,民主体制将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也有局限性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有许多局限,一些主要的局限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向众性、忠于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却难以实现。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



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 50% 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而复选的结果是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于其它多个方面。百姓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了民主下的政治家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视机前的形象比起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还要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百姓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很大的一个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的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显示他/她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施政纲领的正确性。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性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就会发觉民主选举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较大，八十年代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但在台湾民主化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加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因此大选过后大多数人们生活照旧。否则前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一部分人对另一

经给出过以下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 II, III）和三个候选人（A、B、C），选民 I 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 $A > B > C$ ，选民 II 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 $C > A > B$ ，选民 III 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 $B > C > A$ 。这就出现了以下循环：在候选人 A 和 B 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 A（选民 I 和 II），在候选人 B 和 C 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 B（选民 I 和 III），在候选人 C 和 A 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 C（选民 II 和 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选人胜出。类似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湾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略为胜出，但是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地当选为总统。在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

部分人的清洗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同样,目前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中也存在恶霸头子和农村强人操纵选举,村庄中各大姓之间的矛盾随着民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等等,占有相当比重。已被中国共产党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但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均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的确是许多传统国家民主转型的一个困境。

民主社会的向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向众性,即一个国家中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别是电视竞选时代,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是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表达观点和辩论的能力都比较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因为思路太明快常常迫使布什处于守势。但是布什憨厚可爱,其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语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兰(Caplan)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他们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质量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民主的向众性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的精英总是占少数。在威权社会中,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却也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各类思想,以至于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东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民主化后,刚刚有机会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社会就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了。在东欧媒体中被炒得火爆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

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下涌现出来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指出,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海甘心情愿地成了“权力的同谋”、“寡头的小伙计”和“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但影响大大减低,人数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增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这将使得社会变得日益平庸。

忠于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一侧,而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皇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hermajestyopposition),在现代政治学术语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的话,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于反对的党”。这样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抛弃了民主而走向了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欧洲民主走向了稳定,其中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在二战后长期经济繁荣的支持下,走向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不管是来自于右还是左的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依照其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政体、国家领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大量的由前政府制定的有关法律和政策。不但如此,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更具有合法性,二战后欧洲许多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实政治的驱动下经常推出与意识形态相

反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民主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了我们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必须给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的种族清洗，包括美国白人对印地安人在十九世纪的灭绝性屠杀，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

现代民主的中国出路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制比起任何其它政治体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民主国家是目前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民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面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这将有可能会对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弱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下的对于民主转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不至于太离谱。

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百姓素质较为低下的社会，民主转型应以自上而下的发生为好（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形成地方民选政府利用它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英眼里百姓的素质如何低下）。其它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的程序合法性又

不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博、各地差别很大时，为了避免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各地利益高度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民主化初始就受到利益分化的百姓的直接压力，避免百姓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搞民主，怎么建立“忠于反对”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是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根本的价值观上。

第四，一个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搞民主改革肯定会是困难重重。执政者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心而冒进。他们既需要有弹压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来自于左右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缓解和制度化社会矛盾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感，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五，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合力下，而被迫推动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太晚”的感觉，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实感和实际执政的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物，随后兴起的将是在原有政体内分裂出来的各类政客。这些政客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框架下尽情地利用转型社会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各类弱点淋漓尽致地加以放大，给人民和整个社会带来苦难，并大大增加了民主转型的不确定因素，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下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

治手腕。问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身处较好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又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第六,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社会。同样,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来解决。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这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在民主体制之外还非常有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制等等制度。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的特例性事务和大量的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必要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政府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指出在很多场合下以下的非民主制度都将比民主制度来得更有效: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的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缺乏灵活性。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利益时,国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以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来“购买”一些赢利和非赢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灵活性,但该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楚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

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的代表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国家任务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总之,与选举民主—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以上所提及的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作为支撑的话,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这些制度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并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明,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将是一个能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一个能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此文转自《中国改革》2007年12期,作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责任编辑 杨继绳)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上、下卷)已于2007年12月出版,每本45元(含邮费),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5年、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

2005年简装 70元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7年上卷 45元 下卷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商 户 号:111300600

收 款 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 政 编 码:100045 电 话:010-68532048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讨论始末

崔卫平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起风波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这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自称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这份报告受到热情欢迎是容易理解的。承认过去的重大失误，不仅是周扬本人痛定思痛的表现，而且代表了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有勇气、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人民和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来。沉浸于报告带来的兴奋之中的在场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预感：因为这场报告，一场始料不及的新的寒流就在近处不远，历史正是从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一场突然爆发的争论，在经过了一系列演化之后，成为另外一个性质不同的主题。这年秋天10月份，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一年前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是“整党”，但是在邓小平10月12日的全会报告中，除了原定计划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既然不能搞“精神污染”这种东西，于是就需要“清除”它。事情很快演变为全国范围之内的一场“运动”。直至年底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人谈话，提出可能存在“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的问题，并具体提出八条注意事项，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顾骥语），才得以平息，总共持续了“二十八天”。

胡乔木本人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份讲稿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面，很快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似文件如同文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完全否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的任何努力并将有关讨论说成是“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诱发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于

是这场始于 1979 年的大讨论基本结束。

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矫正视点

因为距离文革结束时间比较接近,人们便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这场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讨论主要是总结文革教训,是面向过去的,并由于文革已经成为过去,这场讨论的意义便已经结束。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

由文革结束凸现出来的另外一个语境是:原有价值观念的衰落。这突出体现在 1980 年中期开始的“潘晓讨论”中。这场讨论中反映的空虚迷惘的情绪不能放在文革结束的框架之内,而是提示着在面对“新时期”时,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价值表述。

作为有责任心的党的理论家,王若水对这一点意识得非常清楚:“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和改革的步伐合拍的。”

“反思”的一方主要由三种力量组成。第一拨可以称之为“有备而来者”,他们此前在相关问题上被批判过,主要是在美学和文艺学领域中。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1956 年他因为“唯心主义美学”遭到批判,1979 年他率先发表文章《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钱谷融先生,1957 年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遭到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批判,1980 年他发表了自己写在 1957 年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名为“自我批判”,实质是为自己辩护的。还有一位当年被批判时十分年轻、此番经过重新理论装备之后再度出场的学者是高尔泰,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历经九死一生之后,1978 年获改正之后任教兰州大学哲学系。曾经身处“强化的国家机器”之中,他所认识和捕捉到的问题更加尖锐,表达也更加彻底。

“反思”年代的不同寻常在于:远远不仅是当年的被批判者重新站出来说话,而且是同时期的

一些批判者即否定人道主义的人们,在经历了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重新改变自己的立场,站到了人道主义一边。应该说,这第二拨的力量发挥的作用最大,其中最典型的、动作最大的要数前面提到的周扬。处于他那个身份位置,1983 年春天在中央党校做的那个报告,是下了决心,做了充分准备的。六十年代曾经被纳入周扬“批判人道主义”写作计划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汝信,于 1980 年 8 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表达了“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

真正发挥“引擎”作用的是一批可以称之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人们。1949 年新中国建立时他们才二十出头,但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早年因为信仰而投身革命,后来目睹了自己队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及其在党内外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从而下决心从源头上梳理一些问题。他们其时尚年轻、富有锐气和勇于探索真理。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1926 年生,1946 年进北大念哲学系后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1964 年发表《桌子的哲学》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赞赏,60 年代与周扬因为批判人道主义有过工作接触。还有比如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薛德震,1932 年生,15 岁参加共产党,虽然他的著述没有王若水突出,但是 1981 年初由该社组稿、编辑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书,在这场讨论中起到了“制高点”的作用,其中收入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该书标题是王若水的同名文章,薛德震本人的研究心得也在其内。一年半之后在压力之下,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虽然锋芒远不如前一本,但是将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加以延续。周扬报告中“人道主义”这部分起草人顾骧,1930 年生,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的部队新四军。对于这些党内成员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与革命队伍联系在一起,因而即便是在讨论理论问题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个革命者在组织纪律性方面的约束。这就体现在王若水或薛德震的文章中,他们引经据典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本身,引文 90%都是来自中文版



周扬在作报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偶尔也会用到《列宁全集》，王若水在个别地方还引用过《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

另外一些更加年轻的人们没有这些历史与现实的负担。虽然有着在文革中失学的经验，但是靠着追求真理的热情、问题意识和勤奋，他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当时最重要的知识——马克思主义。丁学良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生人，在短短两三年之内他写下数十万字文章。对丁学良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心，也是枢纽，趁着言及马克思主义，同时展示了西方思想史上其他宏伟有力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展示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一个窗口，当然也代表着它的最高成就。

这场由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与东欧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人性面孔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非常一致，同样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可能性，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矫正的视野。作为理论背景而发挥作用的中文内部出版社还有南斯拉夫学者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

主义制度的分析》，其中系统地讨论了出现在苏联的官僚异化问题；波兰哲学家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主要是回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一时期的错误和过失”而带来的“道德危机”。王若水们与胡乔木和他的专家班底所运用的外来资源完全不一样，后者才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更多地来自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的著述。

争论的焦点或变动的视野

一、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针对王若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提法，胡乔木文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命题”。该文重申了1845年“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的表述之后，指出“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

突出强调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新出发点”，实际上暗含了前后“两个马克思”之分，这是采取了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写于六十年代那本《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基本划分，其时该书某些部分刚刚翻译为中文，1983年2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收录了阿尔都塞这本书一半以上的章节，这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显然给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们注射了强心剂。

涉及到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则问题。王若水当然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他先是采取了一个缓和的提法：“不能把从现实的人出发同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立起来”。稍后，他便将这个分歧及实质表述得更加清楚。1988年他专门为此写下《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于其中他大胆提出——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尽管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也并不能得出结论，“社会关系”与

“人”之间正好划上等号,他(它)们之间天衣无缝没有任何裂隙。他以易卜生的《娜拉》这个为中国人熟知多年的形象为例,指出“对娜拉来说,家庭关系恰恰否定了她的人的本质,使她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人。”因此,“并非任何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相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使人的本质失去现实性,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正是如此,他所批判的正是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二、解释历史与评价历史

处于“拨乱反正”的背景之下,胡乔木和他的专家班底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十七年”否定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们愿意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即将“人道主义”一分为二——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它“是唯心主义的”,“不能对人类社会做出科学的解释”,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后者有一些合理因素可以继承,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

王若水对此提出了强有力质疑。他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所谓世界观不能将价值观念排除出去,而是“应当包括价值观的”,“价值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人“并不仅仅纯客观地解释世界本身是怎样的,他还要站在人的立场(包括阶级的立场)问这个世界好不好,对这个世界作出价值判断”。既然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改变世界便不能停留在对于世界的“解释”上面,而且要对世界作出“评价”。“这个世界是好的吗?它使人满意吗?它应该是怎样的?人希望它是怎样的?……没有这种评价,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愿望。”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珍视的宝贵立场。因为在许多年内施行的,正是一种缺乏人的价值观的做法:在所谓“科学真理”的名义之下,有人声称自己正好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得出前进的方向,因而便可以摆脱一切限制以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什么可以构成他们转动“历史车轮”时的

制约。正是这种历史观中的“唯科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行为上的残忍、残暴,至少给它们提供了借口。

三、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

在排除了人的视野和价值的视野之后,胡乔木文中的“历史”变成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变成一个在生产力的牵引下的神秘演进,因而从总体上看它是“向前,是进步”。在离开了“人”的羁绊之后,这样的历史便一路高歌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被看做“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的阶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门,从此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至于共产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更是意味着人类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伟大进步”。

胡文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做实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典范,其中的关键词一是“生产力”,二是“发展”,三是“进步”,标榜的都是物质力量的胜利,并将这种胜利看做是“历史的凯旋”。强调“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如此彻底排除了任何其他的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比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际上完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讨论的不同阶段,王若水等人表述了不同的“人的价值”内涵。它最初的提出具有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冲动,是在经历了文革对于毛的“无限崇拜”、“无限忠于”的时期之后,人的意识的重新苏醒。2006年年底刘军宁先生倡导文艺复兴,所呼唤释放的其实是从这时候开始寻找出口的能量。而另外有人比如刘宾雁,则不同意用“神性”来解释文革期间的一些做法,认为称呼其为“兽行泛滥”才更确切。1984年王若水挨批之后,在他反驳胡乔木文的文章中,进一步用接近“人权”的字眼来表述,尽管这个词当时不可能出现:“特别是十年动乱,那更是蔑视人的价值,侵犯和践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任何尊严。”肯定人的生命安全、人身的独立与自由,此为“人的价值”的第一层含义。

“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与“劳动者”的基

本权利有关。王若水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工人看作是不足道的，生产指标才是一切，忘掉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忘掉了人不仅有劳动的需要还有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需要，这不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吗？”高尔泰也在文章中尖锐指出：“物的世界越是增值，人的世界就越是贬值。人民曾经一天艰苦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其中涉及到劳动者应得的经济收入、文化及教育条件、自由支配的时间等，具体地呈现了人的价值的内涵，根本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抽象”、“空洞”，而恰恰是这些，胡乔木文并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人的价值”的第三层含义指的是人在物质需要之上或者之外的那部分含义，包括人的“创造性活动”，“个性的全面发展”，它们是在马克思所运用的德国古典哲学及美学的范畴之内。高尔泰、丁学良都表述了类似的看法。丁学良有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便是：“马克思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王若水则尖锐指出，将人降到仅仅“物”的水平之上，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眼光：如果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过百万富翁的物质生活，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它的错误不是把共产主义看得太高了；恰恰相反，是看得太低了，因为在这里使用的价值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尺度。”

“异化”这个怪名词

所有这些讨论，都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异化”问题更是如此。如此“怪”的名词能够进入当时人们视野，甚至上了报纸，只有在那个反思的年代才有可能。在这个外表晦涩的表达之中，实际上凝聚和释放了最大的政治能量。

对王若水来说，这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小小“遗产”。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批判“苏修”人道主义时，由周扬牵头包括王若水等人奉命写一份小册子，题目叫《批判人道主义》。王若水被分派写作“异化”及“人性”这两章。结果小册子没有完成，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前身）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用到了“异化”这个词。

待“思想解放的春风”乍起，王若水便于1979年第一期《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发表了他六十年代对于异化问题的“旧稿”《关于“异化”的概念》，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他应邀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演讲，有人递来条子问“异化”是什么意思，王若水所做的解释，引起人们很大兴味，这就形成了那篇文章《谈谈异化问题》，其中为怪名词“异化”所下的定义：“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基本上成了关于“异化”一词的经典定义。

当高尔泰构思写作那篇十分有影响的《异化现象近观》时，他仍然作为“带罪之身”在甘肃酒泉。这篇文章最初是以断断续续的笔记形式形成于1977年，197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十几年非人生活的历练，使得他一上来便采取了现实政治的立场，而不是停留在学术讨论之中：“异化概念复杂的和能动的涵义，以及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环节，是国际学术界意见分歧、聚讼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探讨那一类问题，也不是要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而是要用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那个异化概念，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不会满足于对人的权利的思辨的承认，而是要致力于变革那些使人异化的现实的历史条件。”

高尔泰文章中最为尖锐的是“权力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权力拜物教”、“政治拜物教”的表述。文中直陈：“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的权力，反过来变成了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运用马克思批判中“商品拜物教”的提法，高尔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权力”相提并论，指出了“权力拜物教”的存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里变成了权力拜物教。权力的世界越是增加价值，人的世界也就越是失掉价值。无数人死于非命，只当做‘交学费’，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一般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异化”的条件下,人民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不仅是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劳动者的实际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都是高尔泰深切关注的对象。“政治参与”当然谈不上,人民实际上被当作“虚无”,沦为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工具:“直接以国家和阶级的名义,要求和迫使人民不断为他们作出牺牲。从而把每一个人变成了他们手中可以任意剥削、操纵的工具。”

而对劳动者的贬抑是与抬高少数人的特权有关——前者越是低廉,后者越是穷奢极欲:“要求你吃大苦、耐大劳、要求你拼命的干,但是不给你足够的吃、足够的穿、足够的休息,还要你每天开会批判、斗争,深夜里不得睡眠。至于住宅拥挤、学校荒废、环境污染、家庭不得团聚之类,更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国家资金的节约,表现为劳动者人身材料的浪费,表现为一个和劳动者相异化、和劳动者绝对不相干的条件。而这同一个条件,也就是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得以无限制的挥霍享受,得以不劳而获地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的那个条件。”身处逆境中的高尔泰,显然模仿起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晦涩的文风和句式。

比起高尔泰杂糅感性与激情的文字,王若水的表达则更加清晰,在根据演讲整理而成的那篇《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王若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三种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和经济上的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意味着“个人迷信,现代迷信”,当然指的是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点的对待毛泽东的迷信。“政治上的异化”同样意味着“权力异化”。“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给这个权力干什么?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之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身为党内知识分子,王若水还在考虑“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经济上的异化”其一是“指不懂经济规律结果的“唯

意志论”,花了很多钱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背了一个大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干劲越大,就越是大吃苦头;其二指今天所说的环境问题,他提到在云南毁林开荒的做法,将森林烧掉要它的荒地,这样做“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建立一个化工厂没有想到它“产生了污染,倒过来危害了人”。

尾声

可以说,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引起的讨论,思想能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当释放,期间所表达的有关尊重人的价值维度在今天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些维度的方向上可以进一步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和完备,但是远远不能说已经丧失意义。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传统也看作是一种传统,就要走更多的弯路。

(责任编辑 吴思)

快乐老人的精品读物
儿女送父母的最佳礼物

乐龄时尚

《乐龄时尚》是国家审计署主管、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主办的一本关注老龄人群、服务老龄大众的综合性月刊。

每月8日出版,每期80页,图文并茂,全彩印刷。

全年定价:93.60元

订阅方式:

- 1、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2、可直接致电本刊杂志社联系订阅(可享受8折优惠)

联系电话:010-68992648/896221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车公庄大街乙5号 100044

收款单位:《乐龄时尚》杂志社

邮发代号
80-546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穆广仁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英雄保尔·柯察金，说出他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止一遍地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不知有多少次特地翻开书中这一段“警句”，默诵着，震撼着。它已经成为我所崇尚的人生观、座右铭。它引导着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人生的道路。甚至，连同保尔自我批判过的过错——他为了他所倾心的革命竟然断绝了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爱情，和丽达分手——也成为我在战斗年代处理爱情的榜样。

保尔在战争年代那种激情，包括那种“左得可爱”的政治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他是完美的；当我知道“切卡”是被人憎恶的“克格勃”的前身，我仍然觉得保尔参加“切卡”的行动并无损于他的“完美”，因为那是残酷的革命年代。在修筑那条运送木材的铁路时，他邂逅了他少年时期情人冬妮娅时，表现出过分粗鲁的态度，显然是出于无产者的阶级感情，对于有些温情主义的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但仍然原谅了他。甚至在我了解了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恐怖，亲历了中国式的“左害”之后，也还没有去想保尔（也是尼古拉）传奇的一生是否有可悔之处。

几个月前，《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载一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侄女加林娜对这家报纸的讲述，才知道他在临终之前再次发出对人生的“警句”：“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哎呀，这不是和我们中国一代人所憬悟的人生如出一辙么？我再一次被震撼了。其实，我今天已不是对斯大林时代完全陌生的人了。从斯大林到晚年的毛泽东，既然是如出一辙，俄罗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雷同，不是理所当然之事吗。我之所以被震撼，固然是由于我对尼古拉的人生了解太少，尼古拉在我心目中就只是英雄，没有其他。但，更多的是，他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曲。我们这一代人常常被人诘问：“你们当初那么热情地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你们难道就不悔么？”我说：不悔。当尼古拉说这句临终遗言时，他是否为“为之奋斗”的人生悔恨了？我以为，他没有！我们呢，不是也不对过去的追求无悔吗？

加林娜是这样叙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12 岁开始做工，15 岁上战场杀敌，16 岁身受重伤，27 岁全身瘫痪，32 岁溘然长逝。在他英雄般的人生历程中，既是勇敢的战士，又是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传遍了广袤的苏联大地。但是，他也曾拒绝对白军开枪，被押上法庭受审。他反对斯大林时期的肃反运动；一些曾经与他并肩杀敌、交情深厚的战友，都没有逃过被逮捕、遭枪杀的厄运。这对于身罹重病的人，不啻沉重的打击。依他的性格，他不会选择沉默。他生前的挚友萨尔达托夫说：“尼古拉的个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 1936 年病逝，迟早会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的。”

对于他本人所受到过的审判、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制度的抗争，是我过去所不曾知晓的。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制度的否定，更加

完成了他人生的完美。加林娜不曾谈及遭受审判的尼古拉是否也被迫作了什么“检讨”之类。据一本名为《斯大林肃反秘闻》的书说,那些为苏联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在他们以“反党、叛国”罪名受到审判时,他们竟把“有损于自己荣誉,而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证据提供给起诉人,这证据就是他们自认为有罪!”濒临死亡的他们不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却为斯大林为迫害他们炮制出来的审判辩护。但是,按照尼古拉的性格,他不会在法庭上自认为有罪。也许,这就是他的战友所以预见到尼古拉早晚也是要被处死的。奥斯特



奥斯特洛夫斯基雕像

洛夫斯基是百分之百的血统无产阶级战士,但是无产者的出身,没有泯灭他所具有的人的共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愫。因此,他不能不受到审判,不能不陷落俄罗斯许多作家的共同悲剧命运。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晚年硬把人道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施之鞭撻。在左祸临头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人道主义”这个“恶魔”,可悲也哉。

苏联作家们在斯大林时代大多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悲剧无非是两种:一是被逮捕、被杀害、放逐西伯利亚;另一是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对极权者做出妥协,甚至为极权制度做过某种服务,先有高尔基,后有法捷耶夫。尼古拉病得早、死得早,没有来得及完成悲剧的全过程。

从加林娜的回忆可以看出,尼古拉对极权制度的反叛,说明他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只是不受压迫,吃饱肚子(不虞匮乏的自由),还有更神圣的东西:民主、自由、人性的尊严、精神的彻底解放。他没有追求阶级专政,没有追求苛政暴政。他过去所追求的,没有错,无须悔;对于斯大林建成的极权社会,他没有顺从,还谴责了,他仍然没有错,无须悔。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尽管也盲目地向往过苏联的“幸福社会”,但其所追求的决非什么斯大林式的极权专制社会;他们热切追求的无非是不愿当亡国奴,

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他们追随共产党,只是因为共产党当时的纲领(被称作“最低纲领”)适应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曾读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的多是通俗性的进步书刊),也不知道中共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从未料到中共解放后一段时间实施的“左祸”。在我所接触到的那个同时代人当中,极少对他们当时的追求有所悔的;至今他们还在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而奋斗着,也仍然无所悔。这就是我所以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句深为感动的原因:“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在叹服尼古拉一生的完美时,不能不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个人迷信时代所表现出的盲从和暴政下的屈从感到脸红。既有损害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无休止的“检讨”,也有对“同类”无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类似的人不能说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间有一段甚至是“丑陋”。这是无法与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悔的一生相比拟的。也许,仅仅是由于认同了“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才被人们美称之为“两头真”的吧。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徐 焰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务，在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60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如今，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再回顾这段让人感慨的历史，仍可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 13 亿美元军火债

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同苏联结盟，是由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殊联系所决定。从共产国际时代起，苏联便以国际主义为立国原则，出资援助他国共产党，同时又伴以“老子党”式的指手画脚。这种两重性体现在苏共对中共的关系上，决定了中苏两国会走向结盟，又注定了后来随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会出现关系破裂。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建立起，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还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以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而论，革命战争期间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是微小数目，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远比不上对国民党的援款。例如按中共历史档案中的财务统计，1927 年国际方面秘密拨付的各种款项总额不足 100 万银元，而按顾问鲍罗廷被

解职回国时所称，苏联向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冯玉祥部的援助价值累计超过 5000 万银元。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转入被包围的农村根据地，经济来源基本靠自力更生，在政治上也能摆脱“老子党”式的指挥而独立自主。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只是秘密向东北解放区转交过部分缴获日本的旧武器（同时还从东北索要了许多物资），并没有提供过本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于 1949 年 7 月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提出购买飞机舰艇等解放台湾急需的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从此开始向解放军提供武器。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 1950 年 2 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 3 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

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二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償（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领导人中间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

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是免费的,只交纸张和复印费,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

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的团结奋斗,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笔者同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谈到此事时,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回顾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军事援华的这段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反复摇摆且缺乏信义,最后采取撤退专家、中断合同的方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后来的多年间,赫鲁晓夫成为中国人指责的对象也属咎由自取,不过他对华给予过的高质量援助还是应该在史册上写下一笔。

“大跃进”时不能按时对苏交货又欠下一笔经济债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联贸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在1959、1960年两年间,国内因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贸易欠债达25亿卢布。

后来国内有一种传说,称中国是在困难年代向苏联归还了抗美援朝所欠的巨大债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其他有些资料列举的欠债数字与此略有不同(一说为59亿元人民币),主要是因计算方式

(如利息折算等)的差别造成。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我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主要已经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协定文本上签字

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1959年以后,国家每年有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政支出,偿还这笔23亿元的欠款,按正常情况而论不应是一个大数目。不过此时国内因极“左”错误指导造成的经济恶果已完全显现,饥荒蔓延各省,用救赈饥民急需的农业产品还债便有一些困难。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因对国际形势和评价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在气恼中竟口出赌气式的恶言称:“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运到北京,供你们欣赏。”为施加政治压力,同年7月间苏联政府又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并中止多数合同。鉴于国内出现的困境,同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而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在争吵后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

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随之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国可延期还清贸易欠款。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由此可看出,在60年代前期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以节衣缩食实行援外的数目(主要是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也远超过对苏还债。

60年代前期,中国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苏仍如期提供实物抵债甚至提前还款。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60至1964年这五年间,中国每年对苏还债额分别为3.63亿、5.19亿、8.54亿、9.61亿、12.16亿元人民币,至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如排除情绪化的传言来进行量化分析,可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对苏还债数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2%左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这段历史,可看出中国对苏还债无疑增加了国家部分开支,在总支出中比例却

很小,当然不会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为表示“争气”提前还债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时,邓小平曾向他深刻说明了过去中苏矛盾“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中苏关系良好时,出现商贸拖欠这一经济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并未引起双方领导人的特别重视。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中国方面显示出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为首”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提出的售粮报价最

低,因中美敌对的政治原因不能购买)。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三年困难时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

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不过从与世界接轨长远地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人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对如何引进外资以促进国内建设的确认识不足,在接受外援和对外援助时如何贯彻经济上互利的原则也缺乏经验,一些做法和说法并不合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

历史证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要取得迅速的发展,必须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一些正常的借款也是需要的。中国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引进装备技术,应着重国家利益考虑而不应过多纠缠政治原则的概念分歧,如果在对外交往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旦发生政治分歧便往往会由亲转仇。这些经验教训不仅体现在中苏关系中,在中国援外中也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立以国家利益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按照市场规律处理对外经济交往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才得以树立起来。

(徐焰,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张申府： “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王贵胜



张申府(1893—1986)

1979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舒衡哲教授在北京王府仓胡同对张申府进行了60小时的采访，从纷纭复杂的中共党史中发掘出了一个“出土文物”。张申府表示：“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实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舒衡哲后来讲：“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文献和回忆，就越觉得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竟然在现代史上被忽略了这一点是多么不可思议。对我来讲，张申府的一生，是一部关于记忆和失忆的寓言。这个寓言如果我不去找它的话，它也

会来找我。”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作为中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作为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领袖，是一个早年轰轰烈烈、晚年默默无闻的人，是一个一度辉煌、半生暗淡的人。纵观张申府的一生，他特立独行，极度自信，固执己见，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一生都在讲真话，始终不渝地做一个与真理同行的人。

“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秋天，张申府被聘到北京大学预科学院教授逻辑。作为一个24岁的年轻人，张申府自视甚高，对如何救国救民有许多新思想新理念。他搞了一个学术组织，成为论坛的主要健将，很快锋芒毕露，引起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注意。张申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公开鼓吹一种新的中国文化。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张申府的一篇文章《危险思想》，其中写道：“死亡、痛苦、绝望、贫病、命运，固然都是可畏的，但是思想能思想它，思想的能力更伟大。地狱的洞里，思想可以走进去巡察，毫无恐惧。将来能生存的人，是去思去想的。”张申府相信，只有像他这样敢于思考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救世者。1919年7月13日，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自由与秩序》，其中讲：“吾们的心，吾们的精神，不但要伟大，自由更要紧。一切心理的束缚，思想的罗网，都须尽先解除。必先有了内部的自由，才有外面的自由可言。”张申府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从这一科跳到另一科，由数学跳到哲学，由逻辑跳到辩证



张申府(左一)与周恩来(右二)、刘清扬(左二)1923年于柏林

唯物论,不断接受新思想,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他说:“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我碰到新的东西时,我就忘记早些时候曾经吸引我的事物。”1914年开始,张申府开始阅读罗素的著作,成为罗素思想的热情崇拜者。从1916年至1919年,张申府几乎读尽了罗素所有的著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14个月中,张申府翻译、撰写了10篇关于罗素的论文。1920年11月9日,张申府给罗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过了几个星期,罗素来到上海访问,张申府见到了罗素,又在北京听了他的几次演讲。他对罗素的演讲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他的演讲就像玉泉山的水,爽人宜人,清冽干脆。”1983年2月,张申府为罗素文集写了一篇序言《我对罗素的敬仰和了解》,最后一次表达了对罗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崇敬之情。张申府曾经自豪地讲:“在中国,一些西方最重要的新的理论与人物最先由我介绍。现在流行的好些名

字和著作,是由我最先翻译和解释的。对于罗素受中国学界的注意,就更明显了。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主要贡献,也是我感觉最光荣的。上述的工作,像我在广大民众中撒播的种子。”同张申府同时进入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梁漱溟先生讲:“张申府先生对西方的认识比我多得多。他亲眼看过和读过西方的东西,他的是第一手知识。”

“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1921年7月,张申府在巴黎为《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实话》,在一大召开前夕发表,其中讲道:“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个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叫“实话党”,但张申府终生都在始终不渝地讲实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产党内部立即大起风波,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反对直接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生气地说:“这不叫国共合作,这是国共混合。”对此,布哈林在《真理报》上进行了严厉批评,陈独秀只好屈从。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孙中山屡次向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共产党既然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围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理由是:马克思在领导1848年德国革命时讲过,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列宁领导俄国革命,首先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当有独立的主张。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在理

论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当时蔡和森说他幼稚可笑，张申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他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他，跟他说赞同他的观点，但请求他不要脱党，他不为所动。后来，张申府来到北京，李大钊、赵世炎都劝他不要脱党，他还是不为所动。他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1980年4月28日，张申府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谈到，周恩来一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此后他才明白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陈独秀在谈到辞去党的总书记的原因时讲：“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陈独秀，在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上都没有张申府觉悟得早，更没有张申府那种义无反顾地反对共产国际决定的勇气。

“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

张申府曾经是一个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他秉承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在“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节，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找在北大任教授的张申府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10月，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成为中共最早的3名党员。1921年初，张申府到达巴黎，组建了中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他来欧洲时，陈独秀已经让他全权负责招收党员。如果觉得某个人适合，他就写信给陈独秀介绍情况。周恩来入党，就是凭张申府的一封信而已。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很快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与党内一些人政见不合，于1925年脱党。当时，他已经看透了中共政策的弱点，认为在1927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之前，中共的策略已经失败。他想要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寻找第三条拯救中国的出路，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张申府讲过：“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不能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革命在这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1927年我们虽然失败，但我们知识分子仍然要寻找出路，我们不能够什么也不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张申府作为主要领导人，他与妻子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被关了5个多月。他后来回忆被捕后遭遇时说：“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艰苦。我今天仍然记得狱警凶恶地喊叫着我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我对我的名字憎厌起来，释放之后我就不再使用这个名字，我只用张申府，一直到今天。”1936年5月7日，张申府才由冯玉祥将军保释而出狱。出狱后，他被开除了在清华大学已经做了5年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他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清华大学政治系的两名教授反对学校与张申府续约，说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学的，没有履行好教学责任。张申府后来讲过：“我坐过一次牢，失去过教授职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的话，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张申府的话，我便会展脱尘世事务。这样，我或许会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讲：“如果张申府能够研究学问，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恐怕会超过他的弟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1936年夏天，张申府离开清华大学之后，全身心地投入组织救国会。到1937年，他是救国会在华北的重要领袖之一，也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设计师和旗手，这个运动可以说是“五四”精神在抗战中的再生。1938年5月25日，张申府在他新编的刊物《战时文化》发刊词中讲：“文化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抗战的有力武器。我们每个人都要超越现在，超越自我，为一个较高的理想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个战时哲学，一个具体的哲学、具体的教育政策，能促进科学的文化、科学

的方法和科学的气质。这是今天最迫切的任务。”1939年4月10日，张申府在《战时文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启蒙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与蒋介石倡导的对战时领袖忠诚、顺从的思想唱对台戏，反对他搞个人独裁。张申府1923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见蒋介石时，便不喜欢他，于是用批判性的战时哲学与他直接对阵。1942年5月7日，张申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与民主》，其中讲：“科学和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精神，不但科学不能成立，民主也必不能实行。现在提倡科学，不应只注意其结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中国政治上、社会上应该实行民主，实在已十分迫切。民主是实践上的事，只有在实践中学习乃最方便。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自在切实保障人民的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爱国、救国的自由。因此，要实行民主，争取这种种自由，便是今日的最当务之急。”张申府高扬“五四”精神的大旗，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冲锋陷阵，使他的批判性哲学在抗战时期大放光彩。尤其是他敢于在陪都重庆毫无顾忌地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说：“中国现在屈辱到这个地步，危急成这样局面，一个人如果对外不能御敌，不能捍卫国土，没有丰功伟绩，对内能独裁吗？”张申府讲：“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我的忠诚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麻烦就发生了。”

1957年4月27日，张申府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发扬五四精神，放！》，大声呼吁思想解放、百家争鸣。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极力提倡解放思想和放松政治的人，指责为最恶劣的右派。章伯钧是张申府的老朋友，1957年的一天，在街上碰到张申府，邀请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1957年6月1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劝导知识分子做出补救行动，彻底摒弃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社论讲：“一切维护社会主义的人，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愿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朋友们，必须同右派

野心分子划清界限。”同一天的《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一则消息，报道农工民主党开批斗大会的情况，标题是《许多人批判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小标题则是《张申府持有异议认为章伯钧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当社论示意知识分子应大力批判章罗同盟以自保时，张申府竟然没有遵从。张申府在批斗会上讲：“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1957年7月15日，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都作出自我辱骂的批判，张申府没有参加这些出卖自己以取得救赎的行动，他把这些行动尽量拖延，最后他还是落得一个右派的下场。但张申府觉得心安理得，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不作违心之论，是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待人接物的信条。1980年1月21日，张申府回忆说：“那时自由的春风好像在政治大地上吹荡着，我参加了讨论，因为我真正相信‘五四’的精神、解放的精神最后在中国结出果子了，但我错了，正是这令我遇到麻烦。当1957年6月每人都攻击章伯钧的时候，我替他说好话。我说他的政治改革的建议不是全部错的，我甚至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站得稳。我又落水了，我被打为右派。”章伯钧的爱人李健生曾经说过：“这就是张申府的性格。他对朋友是，无论你怎样落难倒霉，他从不舍弃你。我永远不会忘记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了。我们已习惯人们避开我们，一见到我们便跑到对面的马路。但张申府没有这样，他向着我们走来，跟伯钧热烈地握手，问候我们的健康。你永远不能感觉到在那寒冷的日子里，这态度使人觉得多么温暖。”对此，张申府讲：“我太老实，太忠于朋友，我没有想到自己。我的忠诚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麻烦就发生了。”我自从18岁参加革命起，就忠实于我的信仰，机会主义者的压力是不能使我改变的。”

“要责人，先责己；见责于人，要先自责。”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其中讲：“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师出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

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真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这篇文章受到了共产党的严厉批判,《观察》杂志两个月后也被国民政府查封,弄得张申府里外不是人。同年1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开除了他的盟籍。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头条报道《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张申府从“人民公敌”上升为“卖国贼”。10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标题是《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张申府的政治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毛泽东讲:“张申府也算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毛泽东讲:“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原来张申府在北大当教授时,曾经帮助李大钊做一些图书馆的工作。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候借书卡片登记错了,张申府就让他去重新登记。解放后,毛泽东讲到此事时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协调下,北京市市长彭真为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1936年彭真在北京做爱国学生时,认识了张申府,并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劝张申府不要回到北大教书,那样他的名誉会再次受到打击。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低调的机构,在那里张申府可以得到一个安身之

所。张申府能够终日与书为伴、拥书而坐,这正是他所喜欢的人生境界。晚年的张申府视荣辱为身外之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深得中国哲学的真谛。面对清苦的日子,张申府总是能够淡然处之。有时候生活实在不能维持,就拿一些旧书报来卖钱。而每次买废报纸的师傅拿走报纸后,他经常想起一些舍不得卖的,就追出去把报纸买回来。有一次他的女儿说要买块手表,他拿不出钱,又不愿意让女儿失望,就把自己的手表给了女儿。1982年7月,他写了《我的世界观——漫谈如何为人、怎样对人?》一文,其中讲:“由知己进而更知人。知如何对人,更知代人设想。要责人,先责己。见责于人,要先自责。”这位老人试图总结自己的一生,同时告诫同时代的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张申府这个淡出历史的人,却始终没有忘记。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讲:“我感谢张申府和刘清扬,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1985年7月10日,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张申府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86年7月2日,张申府以93岁高龄逝世,《人民日报》在公告中对他作了最后的定论:“著名爱国人士、我党的老朋友。”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吴思)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两弹”元勋朱光亚

王建柱



20世纪80年代初朱光亚在办公

被称为“中国两弹元勋”的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能出席建军80周年的庆祝大会。200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登门看望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

温家宝：我以为您是要去参加建军80周年庆祝大会的。

家属：主要是现在他走路太慢了，行动不便怕影响大家。

温家宝：您是个淡泊名利的人，您为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是不会忘记您的。

朱光亚一直微笑地望着总理，始终没有说话。

温家宝：现在不爱说话了？

家属：他原来就不爱说话，现在话就更少了。

温家宝：原来少，但有时还能跟我说一说……

这时，朱光亚的秘书呈上一份朱光亚给总理写的报告，说他想说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温家宝：《关于当前科技的几点思考和建议》，真正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制度。哎，很有用！这我带回去再仔细看。您跟我说两句话吧，就

说两句？

在众人期待中，朱光亚仍然没有说出什么，他微笑着，用眼神回应着总理，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一直摇晃着。

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力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是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一、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5时30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

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祖籍武汉，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从而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则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 I) 能谱》、《符合测量方法 II) 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蒋家王朝覆灭了。朱光亚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于1950年春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了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

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亲眼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手中的高科技和雄厚的军事实力耀武扬威的丑态，这更激发了他献身国防科技的坚定信念。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

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由他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的文章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二、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1958年秋天，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朱光亚受命于旧中国多年求索的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即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的时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原子弹的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伟大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



聂荣臻(中)朱光亚(右)在核试验基地

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中子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然而这些都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作的一次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继承和否定交织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

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久，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这份大纲，十分高兴地在上面批示道：“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亲切地招呼朱光亚：“请坐到前边来！”

当时他只有38岁，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

这是朱光亚第一次面见总理，他在总理对面坐下，激动万分。

临别的时候，周总理紧紧地握着朱光亚的手，

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步步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他们又加快研制速度。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三、在荣誉面前从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他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经常谦虚地对人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这里，他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的那天，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长时期很少出头露面，以至于在宣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当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说：“实在是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这里还要向大家透露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

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身边的同志虽然知道朱光亚这样做一定是经过考虑并且是不易改变的，但还是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回答十分平和，他讲了要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作为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乍听起来，原因非常一般，可是认真领会一下，其中包含了一种真诚的心意，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亚捐款这件事，至于在社会上更是鲜为人知。

朱光亚是大牌科学家，又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但他在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几年中，始终都是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不搞什么特殊化。无论是1996年以前租房办公，还是搬进中国科技馆新址后，他办公室的条件和几位副院长都是一样的，许多第一次到他办公室的人，几乎都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能想象朱院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但是朱光亚从未觉得条件与自己的职务不符，相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严于律己，处处体谅主管单位的困难。由于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的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好站在走廊里值班。工程院搬进科技馆后，中国科协领导人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等领导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一起吃份饭。1998年朱光亚离开中国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又再三叮嘱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不许带走，一定要一件一件整理登记后交上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追忆章士钊先生

周相唐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喜庆日子，也是章士钊先生逝世34周年纪念日。回忆1973年5月25日，章先生乘坐由中共中央特别安排的专机前来香港。随机陪同的有章先生掌上螟蛉章含之。

在机场的除了章先生的夫人殷明珠外，尚有左、中、右三派代表，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及内地驻港机构负责人，港英政府礼宾司代表，以及1949年奉命来香港创办国民党驻港机关报《香港时报》的前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前国民党第11集团军总司令、抗日名将宋希濂的胞弟宋宜山等。

此一突发新闻顿时引起香港及海外传媒的一阵轰动及诸多猜测。事实上，继1972年美国总统一尼克松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下一目标就是要恢复第三次国共和谈，谋求全国统一。他们把目标寄托在章士钊身上，章先生在北京启程前，周总理亲自把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密函交给他。

章先生抵香港之日恰逢殷夫人六十寿辰，他与亲友宴会欢聚后，当晚即将密函转交许孝炎。许氏不敢怠慢，于翌日清晨即飞赴台北面交蒋介石。次年，蒋介石命许孝炎前往北京访问中共领导人探求底蕴。

章先生来港后，为了方便进行统战联络工作，遂决定不住殷夫人家宅以避开喧哗嘈杂的环境而寄居在香港跑马地山村道四十一号地下，该寓所属于港澳名人何贤先生（全国人大及政协常委，澳门特首何厚铨的尊翁）的物业。

年届92岁的章行老，由于体弱多病，难以承受繁重的统战工作，抵港不久即病卧在床。患病期间，他仍然关注香港报刊的时事新闻，尤其是

《明报》连载的一篇文章《在台湾所见、所闻、所思》该文由《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即金庸，撰述他于1973年上半年在台北访问国民党高层包括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的一段经历，深感兴趣。稍后，章先生病情不断恶化，虽经中西名医朱鹤皋、李崧的悉心治疗，终因肺炎与心脏病并发症，于1973年7月1日凌晨病逝寓所。

章先生逝世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社长梁威林牵头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定于7月7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公祭。中共中央领导人亦特别委派连贯先生来港主持公祭仪式，港澳各界一千多人参加公祭。7月12日，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出席大会悼念章先生，毛主席致送花圈。章行老泉下有知，当感欣慰矣。

章先生在世时交游广阔，尤喜赠诗给友人。他写给谊女萧芳芳的三首诗，其中两首云：

莺莺好好到当当，一列双方壮盛唐；
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

婷婷袅袅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
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
另赠陈寅恪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一、对章士钊先生的评价

章先生逝世翌日，《明报》社评云：“章氏一生主要成就，笔者认为是一部《柳文指要》的巨著。至于在政治上的功业，虽然做过司法总长、教育

总长的大官,但并无特殊贡献。他为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和谈而奔走过,为共和谈奔走过,近年来显然对于中共与台湾的和谈很有兴趣,但没有什么成就。他做过报纸的主笔,大学校长,立法委员等等,也说不上有多大具体贡献。在文化事业上,他力主用文言文,那是开倒车的落伍主张。说到写文章,他自负在民初时间与严几道、梁启超二人鼎足而三。以笔者个人的看法,他的文章或胜于严,然远不及梁的动人与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地位大概在于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后一个古文家。”《明报》社评当年通常由社长查良镛先生亲自撰写,未知上述评论是否出自查氏手笔。

胡若谷先生(笔名严静文)著《大清客章士钊的一生》云:“不过从上述章氏一生,可知他之热爱和拥护中共是自1949年开始的。在那以前他也热爱和拥护袁世凯、张学良和杜月笙。也许他心里谁也不热爱,谁也不拥护,但是吃人的饭,受人的管,不热爱不拥护也不行。本来是吃清淡一点的饭,可以不依求权势做清客,可是章孤桐先生办不到,这就决定了他一生做清客的命运。”

上述评论倘若视为对章先生的“盖棺论定”,窃意殊欠公平。他们似乎未察觉章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政局的演变,其影响力之巨,可谓无人能及。兹略举史实如下:

1903年5月1日,章士钊以弱冠之龄任上海《苏报》主笔,该报言论即时从温和趋向激烈,倡议革命,“排满(清政府)、排康(有为)”。在“排满”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章先生在报刊上大力推荐邹容的新著《革命军》。该书极力鼓吹要推倒清末皇朝并且首倡建立“共和国”。章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排康”方面,该报于同年6月29日,转载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文中除了驳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外,并指责光绪帝是“载活小丑,不辨菽麦。”此言一出,朝野震惊。清政府遂勾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于7月7日查封《苏报》馆,邹容、章炳麟相继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也由此发生。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云:“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他在《疏黄帝魂》云:“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势,

可作二期言之。一、从1901年至1905年,为理论鼓吹期;二、从1906年至1910年,为分途实时期。”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云:“孙先生自1894年广州起义,迄今十年期间,除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以外,国内还没有一言论机构。自国内外拒俄言论行动增加,上海《苏报》就形成国内排满革命中心。”在第一期言论鼓吹时,1903年至1904年间是最高峰。《苏报》放言无忌,既开其端,各种刊物小册陆续出现。”章士钊与结义兄弟章炳麟、邹容三人在言论鼓吹反满革命时期,居功至伟。

二、对“同盟会”及孙中山的影响

1904年11月19日,万福华在上海金谷香西餐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遂,被捕入狱。章士钊乃幕后策划人之一,他于翌日前往探监,由于行动可疑亦被捕。在讯问时,章一语不慎,使“华兴会”在上海的革命机关《启明书局》被搜查,黄兴、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名要员陆续被拘入狱。他们趁工部局巡捕未明真相前,利用各种借口出狱。稍后,“华兴会”要员纷纷亡命日本。章士钊无心之失,却促成黄兴有机会首次跟孙中山在东京相晤,并于次年在东京灵南坂成立“同盟会”。尚无章士钊其人,“华兴会”成员不会潜逃日本,仅在上海及大江南北从事革命活动,则“同盟会”何时能组成?唯有天晓得。

1903年10月,章士钊译日人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改书名曰《大革命家孙逸仙》,他在该书序云:“孙逸仙,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云:“章士钊译述与刊行是书均在上海,在当时及以前与孙先生尚无一面之缘,就此序言可见其超然公正立场,自大处着笔作广义解译,尤能把握历史意义。”

章士钊《疏黄帝魂》云:“时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可见“孙中山”的大名源出章士钊之手。《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前,孙中山当时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诚如秦力山在《大革命

家孙逸仙》序云：“孙逸仙只是广州湾一名海贼，知者甚渺。”出版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成为家喻户晓，反而他的真实姓名逐渐被世人淡忘。章士钊对孙中山的影响实在是“非同小可”。

三、对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的影响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离沪去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云：“余（章士钊）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李大钊……六年后，陈独秀、李大钊携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

倘若章士钊当年未曾邀请陈独秀前往日本东京，也未函邀李大钊在东京会晤，则“南陈北李”也就无缘相识。“中国共产党”何时能成立？只有天知。

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云：“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从欧洲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事。他那时正在日本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笔者注：1917年11月，章士钊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先生随后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昌济）、李守常（大钊）进北大之事。杨在北大担任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笔者注：1918年1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自任北大伦理学主任教员）。1918年毛主席初到京时，住地安门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

杨昌济鉴于毛泽东在京生活困难，经济拮据，遂函李大钊建议他聘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自传》云：“1921年5月，我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倘若章士钊先生未曾介绍杨昌济先生及李大钊先生入北大，毛泽东先生亦不会应老师杨先生的函邀离开家乡湖南前往北京，至于进入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就更加无从谈起。他也不可能认识陈独秀、李大钊及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果真如此，则毛先生日后的动向及命运就要另写篇章矣。

章含之《风雨情》云：“1920年……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努力和影响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深知搞革命无钱不行，他获此巨款后，仅拿出一小部分（据某书记载是一千银元）给了赴法留学的湖南同学，余款全部带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8月，章士钊离开香港返国定居后，受到各界人士诸多责难而获得毛主席庇佑，当跟上述一段渊源有关。

在军事上，章士钊一生从未曾当过兵，所以无军功可言。在政坛上，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虽然孙中山在东京时力邀他加入“同盟会”，蒋介石在重庆时请他组织新党，毛泽东在北京时建议他成立“新民主主义党”，但是最终俱未成事。

从表面上看，章士钊只是一个大清客。然而他的一举一动，皆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章先生实在是横跨清末、民国及共和国三个时期罕有的历史传奇人物。

四、两封信

1966年8月20日晚，北大红卫兵抄章士钊住宅。30日晨，章函毛主席。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云：“主席把父亲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立即对父亲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趁毛主席作出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当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张奚若……”

章士钊这封信实际上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总理即时醒悟除章士钊外，应向主席请示保护其他民主党派领袖及国家行政机关若干领导

人。否则,上述诸人在文革暴乱初期的遭遇不堪想象。章士钊除了自救外,同时也救了一大批人。

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遍布全国。同年3月初,章士钊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见章含之著《风雨情》第69页)

曾敏之(前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章士钊一信破玄机》云:“这封信在文革初起之时,可说是空谷足音,祸害之成,其源有自,其源有根,可供有胆识,有正义感的史学家用史笔给以无情地探究与揭露。对章士钊的为人,也应另作‘盖棺论定’,我也改变了对他的腹非。”

曾先生所谓“其源有自”、“其源有根”,读者只要翻阅中共党史记录,当可明了。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全国要“大鸣大放”,目的是要摸清有哪些人会对他的施政有异议。

章士钊的第二封信很自然不会像他第一封信那样起作用。

五、两本书

1972年,国内出版界除了出版毛主席著作及语录外,在古典文学方面,仅出版了两本书,即在9月再版《柳文指要》及10月初出版《李白与杜甫》。两本书的共同点是皆属章士钊与郭沫若的最后遗作,章先生时年九十一,郭先生年八十。两书不同点是“李杜”一书用简体字排印,扉页加插毛语录乃顺应文革潮而著。“柳指”用三号仿宋体排印,没有毛语录,著者坚持不用马列主义观点立论。在学术成就而言,“柳指”一书远高于“李杜”,笔者也就对后者略而不提。

章先生晚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柳文,他稍后将研究心得辑录成《柳文指要》一部百万言的文言文巨著。董存甌(笔名董桥)《章士钊“浮



毛泽东与章士钊

名“满天下》云:“文革年代,《柳文指要》一运来香港,我和戴天午膳时间急忙跑到中环商务抢购,一连几个晚上关进书房苦苦研读,久久为他丰美的行文暗暗拜服。”黄六平(笔名向夏)《章士钊的百万言巨著》云:“章氏能写一手好文章,每写一句都合乎语法和逻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以一个能文的人,他可是没有一般自命古文家的迂腐气息……要是读过这部书的人,就知道它的博大精深,没有六七十年的功力,那是办不到的。”

《柳文指要》早在1965年就已完稿,为何拖延至1971年9月始出初版?据章含之云:“因为在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由于康生从中作难,父亲的《柳文指要》几度修改……主席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父亲……父亲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了这部他的心血之作迟迟不能付印是被学霸康生压下来了……本来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里,当然‘柳文’的出版就完全无望了……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快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

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父亲在信的草稿中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这封信不仅没有惹来杀身之祸,反倒促成了书的最终于1971年出版。”

《柳文指要》出版至今已有36年,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无人对此加以注释出版,使缺乏古文根基的普罗大众对章先生耗费六七十年的心血之作,无从认识,殊令人惋惜。

章士钊《柳文指要》“再跋”题七言长诗,其下半首云:

长途焉用咫尺为? 久暂昨今持一息,
二十年间试回想, 新生万木森森立;
老夫蠢此事何事? 徒抱雄心沸衷臆,
诗成笑比坠驴人, 遮莫夔龙纷满壁。

章先生以“孤桐”自号,他在91岁写上述诗句,显示对政治仍然颇为“热衷”。然而其“热衷”不是想“入党做官”,而是为了“和谈”,不论是“国共”抑或“毛刘”之争。

罗承勳(笔名丝韦,前香港《新晚报》总编辑兼《大公报》副刊编辑)著《章士钊先生二三事》云:“一般人只知道《柳文指要》是他生平力作,是他最后的大著作,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部《指要》,已经写成,还未出版,这是《论衡指要》。”

章士钊《论衡——答张九如》云:“吾家太炎,曾盛称《论衡》一书,谓其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掘,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要之钊于此书,工夫甚浅,第一步要使本子能读,故正在校勘中,时贤孙蜀丞人和,著有《论衡举正》四卷,然所尽之义,十不逮一。钊亦有意踵而为之,一俟句读整理,笺释应有尽有后,拟付手民,取便同志。”按章先生此文原载,1927年1月出版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可见80年前章先生已经对王充《论衡》一书进行校读、笺释后付印出版。罗先生所谓的《论衡指要》应在章先生于1973年逝世前已完稿,为何2000年出版的《章士钊全集》未收入该篇论文?笔者不知原因何在,

仅盼《论指》一书能早日出版,以免湮没于世。

六、两个谜

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抵伦敦约晤章士钊。章当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修读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硕士学位,尚差一个学期就可完成课程。章士钊著《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云:“中山先生之在伦敦也,原要吾掌记,吾率一妻二子,料量不易,迟迟其行。迨吾抵南府,则胡汉民独拥记室皋比,似无余事可办。”“吾废卷东驰,涉冬抵宁,在铁汤池参谋部会客室,重与克强相晤,则千九百十一年冬矣。”

“掌记”即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之职,“料量不易”,指缺乏路费(章士钊《鬻学启》云:“忆岁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士钊挈妻子由英返国,抵沪仅余英金二镑。”可知其盘川拮据),“南府”即南京,“废卷东驰”即放弃硕士学位离英返国。

按上文所言,章士钊当时已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否则,他不会“废卷东驰”。由于缺乏路费而“迟迟其行”,孙中山理应“虚位以待”或尽早通电章士钊“秘书长”之位已由胡汉民接任,则章士钊也不会“率一妻二子”离英返国。此事对章先生的前途影响甚大,稍后,他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时,对孙中山领导的执政党诸多批评,并提出“毁党造党论”,致使双方不欢而散。孙中山当初诚意邀请章士钊“掌记”,当非儿戏,他为何背弃双方承诺?至今仍然是个谜。

1964年夏,章士钊南来香港,黄德华(黄兴幼女)偕夫婿薛君度(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前往章府探望。薛教授把他的新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致送章行老。稍后,行老回赠二首七绝诗给薛氏夫妇,其中一首云:

黄石谁教幻作夫,巾幗稻舂闯江湖;
平生结友无余子,血泪模糊尔与吾;
不见文姬忧愤诗,翻教董祀貌英姿;
魏公自省多遗憾,不涉曹刘战失机。

章先生喜引用古典作诗,人所共知。薛教授对“魏公自省多遗憾,不涉曹刘战失机”两句不明所以。他请教两位专家毛注青及刘逸生先生,亦不得要领。笔者曾就此一谜团详加分析,详情请阅读拙著《章士钊两句难解的诗》(台湾《传记文学》载,2000年8月号),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

张磊

1937年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冒死向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献旗，这种惊人之举和死守仓库的八百勇士的英勇事迹一起，震惊中外，美国新闻媒体称誉她为“中国圣女贞德”。但她此后的人生路充满了坎坷。

女童军冒死献旗

1937年8月13日，被世人称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爆发。当天，国民党部队72军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后升为团长）奉命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当时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这四家银行合设的仓库，在苏州河北岸，此地位置紧临上海市煤气库，日军不敢轻易投弹，仓库东侧以及沿河一带都属于租界范围，驻扎着英、美军队，日军当时还不敢向英美军挑衅。因此，国民党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冒险选中了此地作为掩护部队撤退之所。

26日凌晨部队陆续撤退后，四行仓库被日军包围。此时困守四行仓库的孤军在谢晋元的带领下，以524团全团名义作战，其实只有一营战士（营长杨瑞符），378名士兵。27日起，日军对四行仓库守军进行了多次进攻，孤军作战，战士们身心俱疲，战斗力下降。为了鼓舞斗志，谢晋元致电张柏亭，请求给仓库守军送一面国旗来，并输送食品弹药等物资。

1937年10月29日晨，也就是谢晋元率部进驻仓库的第三天，一面12公尺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在到处都是侵略者旗帜的上海，此面中国国旗格外醒目。半个租界的群众都疯狂了，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

群，连许多外国人也为之动容。一名英国军官在河畔集合了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中国国旗致敬。此事自然成了当天中外新闻关注的焦点，上海《申报》这样写道：“晨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激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在这四面被围的严密封锁中，是谁为守军送去了这面珍贵的国旗，又是如何送去的呢？

原来，张柏亭在接到守军请求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会长王晓籁又把任务具体布置到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

在获知此消息后，团里的杨惠敏立即找到服务团团团长，请求把献旗任务交给她。获准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太兴奋了，我有幸来做这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入夜后，杨惠敏从茶叶大楼出发来到四行仓库以东的公共租界溜过西藏路，从西藏路新垃圾桥匍匐前进。因为租界军的默许，杨惠敏得以顺利从西藏路东侧的租界来到四行仓库东侧，在到达东侧窗口时，已得到消息的守军用绳子把她拉进了仓库。

国旗送到后，军心大振，谢晋元亲率军官迎接。据杨惠敏回忆，当谢团长接旗时，他本人及周围官兵均激动落泪。献旗之后，谢晋元带杨惠敏参观仓库，并看望受伤战士。当看到战士们躺在血泊中的惨况，杨惠敏大受触动，遂向谢团长提出要一份守军的名单，以便国民纪念。这让谢晋元很为难，一方面要严格对敌保密，另一方面又不忍拒绝这位小勇士的一片丹心，于是他让文书从原来第1营的名单中临时抄了许多人名，做了一份假名单给了杨惠敏，此名单上的守军数目比实际人数翻了一倍，约有800个名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29日清晨，杨惠敏参加了守军举行的升旗仪式。当时守军连根像样的旗竿都没有，就临时找了两根竹竿扎成旗竿，配上绳索。升旗仪式规模不大，只有约20余人参加。

升旗仪式结束后，杨惠敏却不肯离开，表示要留在仓库为战士们服务。但此时仓库异常危险，据杨惠敏回忆，谢晋元亲自开了侧门，将她推了出去，并说：“我们永远记得你，去呀，冲过去，跳下河！”因为天色已亮，不可能原路返回，所以她跳入苏州河游回了对岸。杨惠敏回忆说，在跳河时，还有颗流弹从她身边飞过。上岸之后，杨惠敏得到了商会的接应，她马上将名单交给了会长王晓籁，于是“八百壮士”死守仓库的英勇事迹便被宣扬开了。而杨惠敏这位花季少女，也因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人物。29日这天，她的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献旗英雄名声大振

1938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问世，由袁牧之扮演谢晋元，著名影星陈波儿扮演杨惠敏。此时，杨惠敏更是出尽风头，影片放映期间，她多次受邀作游行宣传。南京沦陷之后，杨惠敏被召往战时首都汉口。在汉口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宋美龄的召见。

作为国民党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于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在华侨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会议结束后，中央财政部又电汇了500美元资助她继续旅行，以宣扬国威。杨惠敏此后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约两年内，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英雄之旅”之后，杨惠敏回到了重庆，又被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甚至还安排杨惠敏在相关部门挂名，每月坐领干薪500元。不久，宋美龄又一次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并交待教育部安排。开始时，教育部安排杨惠敏到中央大学旁听，可好景不长，据杨惠敏自己说是因为她“太好动”，受不了这个第一学府

的严规，所以以后又被教育部保送到坐落于歌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但在这里，杨惠敏也不安静，后因参加学生运动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她一气之下又想离开。

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因此她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但是去美旅途遥远，为了凑路费，杨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可见杨惠敏当时在国民党内受关照的程度！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就在杨惠敏在香港准备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留学计划落空。杨惠敏只好化装成小商贩，夹在难民之中转回大陆。她经广东惠州赴曲江，在曲江县得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该委员会在曲江设有难民接待站，主任为陈志皋。

受命营救在港同胞

陈志皋问杨能否接受秘密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此时的杨惠敏充满幻想，一心想投身惊险生活，再创辉煌，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随后，按照陈志皋提供的名单，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营救在港人员，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在营救过程中，杨惠敏与一位军统局香港站通讯员赵乐天认识并结伴同行。赵乐天当时一面为军统服务，一面在“跑单帮”，即可能是利用职务之便，在香港到曲江这条线路上做药品等物资走私生意。赵乐天很快发现了杨惠敏的利用价值，又贪图其青春年少，所以对她大献殷勤，逐渐赢得了杨惠敏的芳心并与其同居。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杨惠敏被赵乐天利用，并被拉上了歧途。据杨自己回忆，她在转运人员期间曾替赵乐天托运过两批西药回内地。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并拟

对她进行妥善安排。据黄慕兰 曾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从事党的秘密战线工作,后奉命脱党,以民主人士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在自传中回忆,“到 1942 年 10 月间,陈志皋怕杨惠敏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暴露被捕的危险,就打电报秘密通知她即速回来,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队去接替她。可杨惠敏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

得罪戴笠遭冤狱

香港沦陷后,“电影皇后”胡蝶有意回内地,所以动员、接运胡蝶回大陆的工作开始进行。据黄慕兰回忆,到 1942 年 11 月的时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已安全到达曲江。可是忽出变故,胡蝶人安全到后,行李却未到。

离港前,胡蝶把自己的衣物、行李约 30 口大箱交给杨惠敏代为护送。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这批“行李”却因太惹人注意,在广东东江一带被土匪抢去了。

胡蝶听说行李丢失后,又急又气,还大病一场。那么这批行李中究竟装了些什么,竟让影后如此动怒呢?

据胡蝶称,她行李内有自己的名贵衣物、首饰,还有各国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等,价值达几十条黄金。但据黄慕兰在自传中指出,这些行李中实另有它物,“他们(胡蝶)夫妻二人在逃难途中,哪会带这么多的行李呢?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如能运到重庆出售,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可以从中大获暴利。”

这些财物丢失,胡蝶自然觉得在那些阔太太面前丢了脸,又气恼又心疼,同时也怀疑杨惠敏的话是否真实,会不会被她私吞了。胡蝶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有些交往,到重庆后也是先借住在了杨虎家,如此心痛之事,免不了要哭诉,所以杨虎、杜月笙便把此事转

告了戴笠,请他帮忙查询。

戴笠对胡蝶垂涎已久,一听说此事即满口应允,他立即派人去湖南株洲,把杨惠敏及他的情人赵乐天一并拘捕,押往重庆。同时,派人南下四处追查这批财物的行踪。后曾发现这批货物曾在广西桂林一带市场上公开出卖,因其中有一件胡蝶自己穿的貂皮大衣被认出。但销赃的歹徒拿到钱后,早就溜了,根本查无线索。

调查无果的戴笠为了讨好胡蝶,按照胡蝶开列的失物账单,遣人火速从国外照单购买,然后谎说追回了部分财物。胡蝶虽心知并非原物,但考虑到这些物品价值更高,也就心领神会,不再追究了。

除了胡蝶的原因之外,军统逮捕杨惠敏还另有他因。据《黄慕兰自传》中回忆,“杨惠敏被捕入狱,这真是飞来横祸,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陈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赈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如今正好借着胡蝶的告状,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对我们下手了。”可见,杨惠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民党方面破坏国共合作、打击中共的牺牲品。

杨惠敏开始时被监禁于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后转送重庆渣滓洞。军统局对她也甚感棘手,杨惠敏当时是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国家级抗战英雄,且受到过蒋夫人的召见,所以并不敢用刑整她。审也审不出,放又不能放,戴笠干脆将这个案子拖着不办。据当年因违犯“纪律”,被拘押在渣滓洞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组长王仁德在 1985 年写的材料说:“杨惠敏在渣滓洞经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如此审问无果,戴笠只好给杨惠敏扣了个与赵乐天勾结,泄露军事机密、有通敌嫌疑的帽子。

1946 年春节时,经王仁德说情,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濮齐伟才同意让杨与赵乐天一道排演京剧,分隔多年的杨、赵两人始初次面晤。杨惠敏感伤地说:“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几次想自杀,只是死不瞑目。”

抗战的胜利给杨惠敏的黑暗人生带来了曙光。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将杨惠敏一案转给了地

任仲夷同志的一幅珍贵墨宝

杨 慎

2004年12月初,我应广东省企业联合会的邀请,到广州去作一场演讲,时间是12月3日上午,地点在广东国际大酒店。任仲夷同志是这个联合会的高级顾问,也应邀出席。那天他来得特别早,我们在休息室寒暄片刻后,他便问我:今天讲什么题目?我说准备讲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住房建设问题,并顺手送他一份讲稿请他指正。他幽默地说:指正不敢当,改成拜读吧!不过,不是我拜读而是你拜读,因为今天上午是你讲我听。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这时他又一本正经地说:“科学发展观”提得好,既简炼又明确,说明新一代中央集体有高人。以往很长时间,我们事没少干,钱没少花,骂没少挨,就是吃了不尊重科学的亏,嘴上讲按客观规律办事,实际上按长官意志办事,什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都不在话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还是斗斗斗那一套……说到这里,工作人员催大家入场,会议即将开始。仲夷同志可能感到言犹未尽,顺手

从桌子上拿了几张信纸与我一同进了会场。落座后他环视了一下会场四周,接着一口气写下了下边一段话递给了我。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自做孽,古语曰,人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我说的自做孽是指做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

这是我与仲夷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没想到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诀。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连夜找出那张便笺摆放在我的书架中。那苍劲犀利的文字,凝结着他居高望远的深邃思维,隐含着忧国忧民的赤胆忠诚。我在想,这不单是诤友之间的叙谈,也是他留给后人的醒世箴言。

(2005年12月12日)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

方法院审判,并做出了无罪释放判决。1946年1月4日宣判杨惠敏无罪开释。赵乐天获判罪刑已相抵,亦可同时释放。按理杨惠敏即可出狱了,结果却仍然被囚禁。因此案是戴笠交办的,放人须戴笠亲批不可,可直到戴笠死前也迟迟未批,所以虽然法院作了判决,也无人敢放。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失事,戴笠摔死后,他的亲信毛人凤才批准放人,把杨赵二人转押到了南京,在具结保密手续后放他们回了原籍。

后记

1946年获释后,杨惠敏曾在江苏镇江老家与赵乐天同住了几日,但后来据杨惠敏从家乡寄给一位监友的信中透露,几日后赵乐天出走上

海,最终抛弃了杨惠敏。1949年,大陆解放,杨惠敏去了台湾,定居台北,已人近中年。在台湾,她继续受到国民党高层照顾,而且曾经再获蒋夫人召见。经介绍,她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湾大学体育系教授朱重明结合。

1967年杨惠敏出版了回忆录《八百壮士与我》一书。1975年,中国电影公司开拍了影片《八百壮士》,内容大量采用了杨惠敏的回忆,由林青霞扮演杨惠敏。此片正式首映时,年迈的杨惠敏还亲临现场,以示对这段历史的纪念。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1980年2月,病床上的杨惠敏又突发脑溢血中风,神志模糊,从此再没有清醒过来,直到1992年3月9日去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伯父黄秀善离家 60 多年杳无音信，家里人都以为他老人家早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年已 80 多岁高龄的伯父于 2005 年 9 月竟奇迹般地从台湾回到了老家。

伯父 17 岁被抓丁到了国民党部队，转战南北，许多人血染沙场，九死一生，伯父却因做得一手好饭菜，被阎锡山某部选做伙夫，后被阎锡山看上留做厨师。在伯父的叙说中，我了解了一些关于阎锡山败走台湾后的轶事。

(一)

1949 年 12 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残军败匪，一举攻下贵阳、遵义后，分兵三路，直指成都。

12 月 8 日，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在一片凄风愁雨中，乘专机飞抵孤岛台湾。从此别祖离乡，再没有回过大陆故土……

阎锡山到达台北后的当天下午，即在寓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迁移台北办公。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宣告结束。

阎锡山刚到台湾时，还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意味。他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复宣传来台湾后的施政方针，并多次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内部不讲诚信、不讲团结，大讲总结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立足台湾好好干一番事情。

殊不知，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对阎锡山这帮不忠不孝的部下心存芥蒂，正在重新考虑“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的用人政策，历来是以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上，被称之为“山西土皇

帝”的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蒋介石直接对垒。蒋介石对他一直心怀不满，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团结为要务，于是对阎锡山还比较客气。

但阎锡山有自己的个性，虽然他知道自己这个“行政院长”，看似权力很大，其实是一切事情以老蒋的意见为旨，老蒋说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阎锡山十分讨厌，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到处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指责就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才将大陆拱手让给了共产党，同时对国民党内部帮派之间的矛盾也十分不满，对国民党的一败再败的战略指导思想，多有责备之意。

阎锡山的讲话，尽管是出于一片苦心，但却处处刺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这些话如果让老蒋本人来讲，一点事也没有，而阎锡山却毫不顾及蒋介石的面子，句句话带刺，这就使蒋介石感到难堪。于是，马上换掉阎锡山的想法很快就在蒋介石的脑子里形成。

早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夕，蒋介石就卸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之。而这时，李宗仁远在美国，按照国民党所谓的“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台湾就应该是绝对的权威。但蒋介石早就把这些所谓的“法统”丢在脑后，对“行政院”的工作，事无巨细，处处过问。特别是人事上的安排，蒋介石更是牢牢抓住不放。1950 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便把

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与他商量“行政院”改组人选的事，其实就是通知他应该换调哪些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形成了以下的人事任免名单：

- 一、谷正纲代理“内政部长”；
- 二、陈良任“交通部长”；

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黄禹康



阎锡山

三、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

四、“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丘念台继任；

五、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由俞鸿钧担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谷正纲、顾祝同、俞鸿钧等蒋介石的嫡系接替了阎锡山的人马，就连阎锡山本人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失去了。

“行政院”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各方人士的不满。一天晚上，阎锡山刚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一帮四川籍的“立法委员”闯进了阎的官邸，他们气愤地质问阎锡山：“这次‘政府’改组，为什么四川这么一个大省，竟无一人‘入阁’？”

这一问，倒把阎锡山问住了。因为他名义上身为“行政院长”，但改组人事，他却不能作主。这次改组，他圈子里的人也“改”掉不少，但这又怎

么好与人说明呢？阎锡山一肚子苦水无处倒，自己没有落得好，反而当了老蒋的替罪羊，处处遭人埋怨。

(二)

蒋介石频繁干预“行政院”的正常事务，弄得阎锡山十分窝火，时间一长，他就产生了卸任的念头。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复职。“登基”仪式完毕，阎锡山便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

阎锡山提出辞呈，蒋介石心里很高兴，但嘴里仍假意挽留一番。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来到“行政院”阎锡山的办公室，与阎长谈，安抚阎锡山。

3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了由蒋介石主持的临时会议，会议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报告，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的仗，到了老年，才似乎悟到什么叫失落。离职前，“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阎锡山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庄子·取筮》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阎锡山意味深长地说：“无珠宝而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人不污辱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阎锡山的这番话，表明了自己决心与世无争的心态。

卸去“行政院长”后，第二天阎锡山就将家搬到了台北地处偏僻的丽水街。搬到新家的当天，他就开始写《人应当怎样》。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述了自己离任后对时势的悲观，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幻想。

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著书立说。

半年后，阎锡山又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

菁山原来是日本人占领台湾期间兴建的未成的农场。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小道两旁，杂草没膝，人到之时，野兔四处逃窜。

阎锡山来到这里之后，让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草庐。

台北地处台湾北部盆地，每年一到夏季就酷热难耐，而且台风频频光临。草庐抵挡不住炎热和台风，他便想起了山西老家的窑洞。窑洞冬能御寒，夏能防暑，又不怕台风侵袭，何不在这里也建一座窑洞呢？他找来当地的一些老农询问：“为什么台湾没有窑洞？”那些老农回答说：“这里土地潮湿，不适挖洞。窑洞空气不流通。再说台湾经常闹地震，挖了洞恐怕也受不了震动。”

阎锡山认为，窑洞的这3个缺点都有办法解决。窑洞四周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湿。将窑洞前后各开一扇窗，就可以解决空气流通问题。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一样，楼房设计得好能防震，窑洞设计得好，也一样能防震。

于是，阎锡山便让人建了一方窑洞。窑洞建成后，他以自己的所谓种能宇宙观，将窑洞命名“种能洞”。后来，他又向附近的台湾金铜矿物局租了一大片地，建了一座“种能农场”。阎锡山在农场里，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写作累了，他就在这里锄草种地，打发时光。

阎锡山的儿子在美国，他自己在日本也有许多亲戚。据说，他卸任后不久，曾一度想移居美国和日本，却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地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现在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菁山草庐，专心著述，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往菁山探视。蒋果然看到脱下军服的阎锡山学问很有心得，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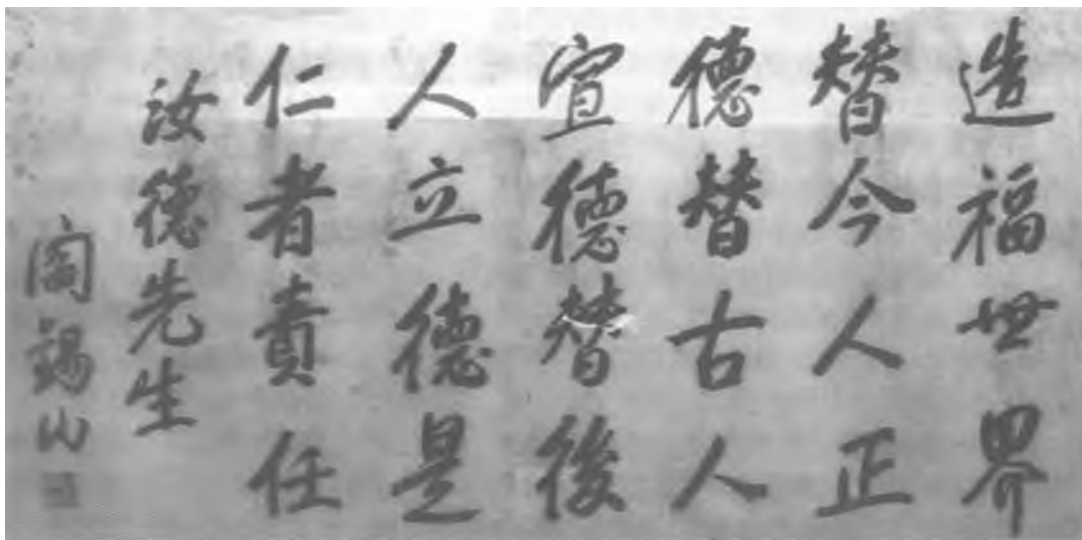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他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七

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思考问题；晚上十点钟准时入睡。这期间，蒋介石曾几次上山来看望阎，这对阎锡山来说，也是一种殊荣。

阎锡山在国民党中也算是老资格了。他其实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但是自从卸任以后，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固然是人情冷落、世态炎凉之故，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阎锡山来台湾后，从大陆带来的嫡系很少，且他自己从政多年，结怨、树敌太多。如他与蒋介石进行过中原大战，与政学系争夺过西南地方权力，与白崇禧争夺过“国防部长”之职……这样一来，势必把自己放到了与众人为敌的位置上。所以，他在菁山十年，除老蒋去看过他两三次，陈诚接手“行政院长”后，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外，国民党政要人员当中，再没有其他人士上山看过他。倒是一些报刊、电台、影视记者，出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以及残留在台湾的“五朝元老”颇感兴趣，屡屡登门造访菁山。所以，阎锡山潜心研究的所谓“大同主义”中和哲学，常见之于台湾报刊，这对处于世人冷漠之中的阎锡山，多少也有了些慰藉。

(三)

1959年，阎锡山已是77岁高龄。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阎锡山已患上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



便劝他住院治疗，阎锡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时时记挂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1960年元月，《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终于完稿。阎锡山又雄心勃勃，开始重新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经》。

这一年的5月2日，阎锡山忽然腹泻。第二天起床便发现腿部浮肿，经过医生治疗，身体很快康复。可是到了5月10日，阎锡山早上起床后又感到不适，遂请医生来家治疗。第二天半夜，开始气喘。医生诊断为感冒转气管炎，建议入院治疗。这时，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赶到，诊断为急性肺炎并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病情此时已十分严重。

5月23日上午，阎锡山被送进医院抢救。到下午1:30分钟，阎锡山病情加重，大口喘气，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虽经医生大力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宣告无治身亡。时年78岁。

阎锡山死后，台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哀，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老勋”。

阎锡山死前，曾立有以下遗嘱：

- 一、丧事宜简不宜奢；
- 二、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幛；
- 三、灵前供无花之草木；

- 四、死后早日出殡不要久停；
- 五、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
- 六、碑墓上刻着他的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
- 七、七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夫人将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地区后面。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锡山生前，曾制作挽联数副，嘱其家属在他死后，刻在他的墓碑上。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阎锡山一生极力反共，在临死前，还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他一生从政从军，不得意的时间居多。这副挽联，正是他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之哀叹矣。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按需出版

我公司“按需出版”广告自2004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反响，三年来已为国内外的中老年作者出版了数十种个人传世作品，并获得信誉、服务及质量的良好评价。现继续征稿。

三大优点：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自费。以20万字288面、规格大32开本为例，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亦可参阅本刊

继续征稿

2004年第9、10期所登广告。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印制质量：70克胶版纸印刷，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088，热线：010-59870796，陶女士；手机：13901158422 张先生。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本广告长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7年9月

还纳吉以清白

侯凤菁

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在中国长期以来没能得到人们充分的了解，一直作为“反革命”存留在众人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甚至污辱性地将当时主持国民经济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称之为“邓纳吉”。然而实际上，纳吉是匈牙利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次任政府总理期间都因触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要害和维护匈牙利民族独立而深受迫害，最后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被送上绞刑架。

莫斯科的政治流亡者

纳吉·伊姆雷 1896 年 6 月 6 日出生在匈牙利中部城市考波什瓦尔一个信奉新教的铁路工人家庭。他读了 4 年中学就当上了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之后在俄国前线被俘。在西伯利亚战俘营期间，他接受了革命思想，1918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 年，纳吉作为共产党人秘密回国，以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在家乡的农民当中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入狱。1928 年他到了维也纳，1930 年初流亡到苏联。

那时，在莫斯科流亡的一批匈牙利共产党人有各种派别，相互争论不休。纳吉远离这些派别斗争，潜心研究农业问题。1930 年至 1935 年他先后在苏联国际农业科学研究所、苏联中央统计局和一所农业大学工作，撰写了 3 部书和 20 多篇科学论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直在莫斯科从事农业政策的科学研究，深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布哈林理论的影响。从这时候起，他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产生了歧见。1930 年 2 月，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



纳吉

召开，纳吉在会上被指责为“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出右倾观点”，被迫作出自我批评。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主张东欧各国革命成功后，都要把没收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认为分配给农民个人是有害的，而纳吉根据实际情况主张匈牙利革命胜利后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人使用，以便在一个时期内发挥该国个体农业发达这一优势的作用。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期间，纳吉报名参加苏联红军国际旅，准备上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军训结束后，在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下，他被调离部队，被任命为莫斯科广播电

台匈牙利文播音部代理编辑，后来又又被任命为专对匈牙利播音的科苏特广播电台的编辑。1944年他被调去协助苏联的一个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负责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供关于在即将解放的匈牙利建立民族独立阵线和制订匈牙利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其中包括战后建立匈牙利政府的设想等内容。

1944年11月1日，纳吉回到匈牙利。他是第一批随同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回国的在苏联流亡的匈牙利领导人之一。他与同行的其他同志一起，在解放了的第一个大城市塞格德建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公开的中央委员会。纳吉作为共产党的代表，成为临时国会的议员，还是临时民族政府的农业部长。那几年他在自己岗位上从事的活动给匈牙利人民，特别是给广大农民留下深刻印象。他主持了匈牙利的土地改革，亲手将第一根木桩埋进分给农民的土地里，象征着全国土地改革开始。最后，从大地主和教会那里没收和赎买到的560万霍尔特（每霍尔特约合0.5公顷——作者注）土地大部分分配给64.2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户。从此，这个像农民一样粗壮，经常戴一副老式夹鼻眼镜的共产党领导人就鲜活地走进匈牙利公众的视野。

这时，他为维护匈牙利农民的利益，竟有一番足以使一位苏联元帅大为吃惊的举动。在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土地上，以解放者自居的苏军部队纪律很差，抢劫商店、盗窃财物、强奸妇女、毁坏庄稼和森林的事情经常发生。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此听之任之，只有纳吉怒不可遏。他作为农业部长不止一次地向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提出抗议，要求苏军整顿纪律。作为一个在苏联流亡过的共产党部长，纳吉竟敢向解放者挑战，这不能不说在这偶然之中表现出他固有的秉性。在他的理念中，当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要求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宁可舍弃前者也要维护后者。这正如后来他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国际主义离开了对本民族的忠诚，离开了对本民族的独立、主权、自由和平等所承担的责任，不能充当本民族的合格代表，那么工人阶级的国际性就不可能是马克思用社会主义解释的国际性。”

抵制极‘左’路线的‘右倾分子’

土地改革开始半年以后，纳吉由农业部长调任内务部长。4个多月之后，他又被撤换了，因为发现他过于“宽容”，不适合领导警察的工作。他被调任国会主席这一显赫而又相对轻松的职务，有很好的政治、物质待遇，只要不说错话就能在政坛上一帆风顺。然而他做不到，在真理与良知面前他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与党的政策发生了分歧。

事情发生在1948年。那时斯大林作出东欧各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一伙闻风而动，提出三四年内就使全国90%的农民入社。纳吉主张匈牙利的农业合作化要根据现有条件分阶段地进行。另外，他还认为匈牙利农民分得土地还不到3年，现在强行把他们刚刚获得的小块土地夺走，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在一次与拉科西的谈话中，纳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用这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他在自己《与中农的关系》一文中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这种看法，表示“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过火的。”执行这样的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要跳过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其结果是纳吉被指责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他虽然遵照共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了检讨，但还是受到批判并被赶出政治局。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被贬到外地的一所农业大学任副校长。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段时间正是拉科西一伙实行极‘左’政策进行全盘苏化和对党内外人士搞大清洗的高峰期，纳吉因为被贬谪避免了在高层参与一系列迫害无辜的事件，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唯一手上没沾血的领导人。

匈牙利共产党于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从而结束了1945年以后的人民民主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党的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与格罗·埃尔诺、雷瓦伊·约瑟夫和法尔卡什·米哈伊一起结为“四人集团”（又称“四驾马车”）独断专行，无视本国具体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严重失误，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们还大搞个人迷信、破坏民主与法制，制造许多冤假错案，实行群众性恐怖。拉科西一伙

就这样紧紧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1953年,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局面。“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机械推行苏联斯大林政策的领导集团。这种状况的出现对苏联的利益是严重的威胁。

纳吉在1950年重新被起用,先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长,后改任征购部长。1951年3月他象征性地作了一次自我批评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次年11月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当匈牙利政治危机日益严重、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一些城市开始发生骚乱之时,纳吉·伊姆雷被苏联领导人选作可以用来缓解匈牙利社会矛盾的最佳人选。

替苏联“救火”的新总理

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不久,包括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什在内的一个匈牙利代表团被召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最有影响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见。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人的干预下,纳吉被推举为匈牙利政府总理,为他们拯救可能发生坍塌的苏联帝国的一角匈牙利而去冲锋陷阵。对匈牙利出现的危机负有责任的拉科西受到苏联领导人的严厉指责,被免去兼任的总理职务,只担任党的首脑,改用第一书记的头衔。苏联领导人交给纳吉的任务是恢复匈牙利即将崩溃的经济和使社会保持安定。

匈牙利代表团刚刚回国,东柏林就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罢工很快蔓延到东德其他许多城市,最后被苏军出动坦克镇压。这给苏匈领导人再次敲起警钟。匈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按照苏联的指示决定在政策上“急转弯”,拉科西和“四人集团”其他成员都就过去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953年6月27日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批判党的领导过去犯的严重错误,全面调整经济政策和对领导层进行人事变动,被称之为“六月政策”。在7月3日至4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会议上,纳吉作为政府新总理依照“六月政策”发表了施政纲领讲话,被称为“七月纲领”。从此,匈牙利

进入纳吉第一次执政时期进行改革的“新阶段”。

纳吉主持政府工作后不是简单地纠正拉科西时期的左的错误,而是大胆地进行改革,包括以下五方面主要内容:第一,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和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消费品生产,进行住房建设和加强农业生产;第二,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停止强迫农民入社,准许农民退社,利用市场和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减轻农民交售农产品的负担;第三,以降低物价、提高工资、节省公务开支等手段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第四,限制强力部门的权力,消除社会恐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第五,改造政权机构,废止党的部门专权,使政府从党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同时向群众提供广泛参政的可能,试图在一党制的范畴内建立一种比较民主的多元执政形式。

“新阶段”政策很快收到了成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市场开始繁荣、农业生产发展、社会上压抑的政治气氛得到缓解、许多过去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得以恢复名誉。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热烈拥护纳吉的“新阶段”改革。然而,由于权力受到削弱而一直抵制“六月政策”的拉科西一伙却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兴风作浪,收集各种材料攻击和诋毁“新阶段”改革。

纳吉1954年10月在党报《人民自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几天后又在爱国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倡导发展“社会生活民主”的讲话,这为拉科西一伙进行反扑提供了口实。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抓住纳吉的这个“小辫子”。在当时盛行号称阶级专政的气氛下,民主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许可提的。拉科西一伙人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大肆活动,终于告倒了纳吉,并立即返回匈牙利,在出尔反尔的苏联领导人的支持下开始围剿纳吉和封杀“新阶段”改革。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这时之所以要抛弃纳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苏联领导人给他的任务只是在匈牙利尽快简单地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他却要在经济、政治领域认真地搞改革,在利用市场、扩大民主等方面大胆妄为地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神圣模式的框架。

1955年1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

在莫斯科再次召见拉科西和纳吉等匈牙利领导人,纳吉被送上“被告席”。然而纳吉据理相争,在苏共领导面前拒不进行检讨,坚决捍卫“新阶段”改革。这使拉科西有了进一步打击纳吉的理由。

1955年3月2日至4日,拉科西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提出纳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不久,纳吉声明“出于政治原因”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匈党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从此,“新阶段”改革无疾而终,拉科西在许多方面又恢复了他1953年6月以前的极“左”政策。

然而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改革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要是一些科学家、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政治勇气,从不同角度反对拉科西的政策和赞同纳吉所追求的那种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民族独立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在“新阶段”被扼杀之后把自己的命运同纳吉联系在一起。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得那么多理论,但对纳吉与拉科西政策之间的差别都心知肚明。

1955年12月,匈党中央宣布开除纳吉的党籍,理由是他拒绝检讨错误和在自己周围纠集成“反党集团”。

新思想的探索人

从1955年夏天到1956年初,纳吉在失势的日子时埋头撰写他的长篇政治论文,为“新阶段”政策辩护。他的初衷是将该文交给党中央和苏联领导人明察,以求判明是非。这篇约合中文23万字的长文真实和集中地反映了纳吉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大胆探求。

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纳吉认为“应该考虑并且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他强调对待像马克思这样伟大导师所制定的天才学说,也“不能只限于重复旧的论点,因为没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可脱离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加以运用的学说”。他认为:“斯大林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条主义,使勇于探索的理论工作陷于瘫痪……”假如我们不跨出斯大林教条所圈定的狭小天地……那么世界将在我们面前飞速前进,

而我国就会落后。”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上,纳吉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应是“多样化”的。他反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指出也要考虑和平过渡的道路,“还要考虑到哪条路最有利、最恰当,即代价最小、最能避免痛苦,因而也最人道。”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绝不是越来越多地运用和激化暴力、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强制手段”。

在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纳吉认为在完全不同的国内条件下“生硬模仿苏联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他指出,将苏联的做法“说成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正确而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会给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造成特别严重的困难”。因此,他主张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必须要能使本国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

在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纳吉创造性地提出将由中国提议、经万隆会议确立的五项基本原则也运用于各兄弟党之间。他说:“事实表明,五项基本原则不能只限于同资本主义制度或两个体系间的斗争,也应该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去。”“五项基本原则不但在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占和奴役企图的斗争中,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都是巨大的推动力量。”一年以后,苏联承认了纳吉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端端正正地写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

在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纳吉强调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独立必须“协调一致”,各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保持自主。他说:“把社会主义凌驾于民族之上,从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民族性,曲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世界主义的歪曲。”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民族独立,如果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能自主,不能适应民族使命的要求,民族独立就不能保证。”

在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上,纳吉认为社会的腐败与道德上的堕落反映了政权的蜕化,说明“那些

行动严重违反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条文的人,也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领域起着领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纳吉主张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既定方法和形式,它在每个农民小生产者数量众多的国家中都是必要的。”他主张“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纳吉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业个体经济应该结合、不允许把它们对立起来的学说。他认为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匈牙利,“小农经济的富裕部分,尽管受规模狭小的限制,还是有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的。”“在发展大规模生产合作社经济的同时,中农的富裕生活、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增加,是迅速消灭农业落后现象和发展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匈牙利在坚持合作化这一农业发展的主要道路的同时,在一个时期内也要保持另一条保护中农经济的“非合作化道路”。

从纳吉上述一些主要思想可见,他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早在苏共1956年“二十大”之前,这位共产党领袖就在为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苦苦地上下求索。

十月事件的牺牲品

1956年苏共“二十大”进行“非斯大林化”,“解冻”之风也吹进匈牙利。斯大林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拉科西·马加什一伙仍然拒绝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与罪行,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年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以声



1989年,匈牙利为纳吉平反后举行国葬

援波兰抵制苏联干涉内政为名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第二天,苏联驻军的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帮助恢复秩序”,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更多的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抗击进行武装干涉的苏军。全城各地的武装小分队筑起街垒,手持轻武器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与苏军搏斗,在短短的几天内炸毁苏联坦克200多辆。匈牙利工人为抗议外来的武装干涉举行了全国总罢工,警察和军队大部分倒向起义者一边。

为了使愤怒的群众停止武装抵抗,纳吉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过去实行过的多党制。在这社会动荡的时刻,社会上也发生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为,一些过去残害百姓的国家保安局人员被群众施私刑处死,市委大楼门前杀害市委工作人员的事件使这股逆流达到顶点。这些情况的出现,使苏联领导人对纳吉政府的态度开始犹豫不决。

10月30日苏联发表政府声明,表示愿意“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市”和同匈牙利“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然而就在第二天,大量苏军却又潮水般地涌进匈牙利,早先撤出首都的苏军开始在郊区修筑工事和占领有利地

形,显然一场外来军事侵略即将来临。11月1日,纳吉紧急召见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要他解释苏军调动的原由,并要求苏联保证不再继续向匈牙利派兵。安德罗波夫只是一味地敷衍,明显地是在当面撒谎。纳吉意识到,莫斯科已改变了立场。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苏联最初怕因对匈采取强硬手段引起美国干涉而准备妥协,打算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从不危及过去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为底线,因而赞同纳吉的一系列做法。后来开始担心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效法匈牙利并出于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本国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美国这时也一再发出不准备介入匈牙利事件的信息,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于是,苏联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磋商后决定对匈派兵镇压。就这样,纳吉再一次被苏联领导人所抛弃。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最初反对苏联出兵干涉,还要苏联领导人吸取他们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教训,但是后来又改变了态度。毛泽东10月30日晚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时指示,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同志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中共中央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刘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要撤军的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第二天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同志去飞机场启程回国的路上无不献媚地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决定对匈牙利出兵。

面对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以卡达尔为首的匈党领导机构作出决议:为了使苏联出兵失去合法性,建议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国家中立。这个建议经纳吉政府讨论通过,并得到国家元首道比·伊什特万的批准。匈牙利外交部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保护匈牙利的主权。这时匈牙利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走向正常,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总罢工也即将结束。然而当苏联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带着这个信息回到莫斯科时,苏联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决定已不可更改。

11月3日夜晚,苏联人先是诱捕了与他们就

苏联撤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然后在11月4日凌晨向布达佩斯发起武装进攻,共有12个师的苏军兵力参加这次“旋风”行动。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纳吉向军队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自己带领一批党和政府的主要官员到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这时,不久前失踪的匈党第一书记、政府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等人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支持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卡达尔任政府总理。

在苏军的帮助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等人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8天后离开时在回家路上被苏联克格勃人员劫持,先被送到罗马尼亚关押,后又在国内被长时间监禁。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在当时具体的国际条件下由苏联领导人操纵,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8年6月16日被绞死,成了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替罪羊。他留下感人的政治遗言:“我曾两次在我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由杀害我的人替我平反昭雪。”他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989年7月,也就是在匈牙利共产党(即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执政期间,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已宣布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决,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和墓地为屈死的纳吉及其同伴举行国葬,政府总理内梅特等人为纳吉等死难者守灵。于是,1956年事件在匈牙利已被公认为“人民起义”。在另一个当事国苏联,早在1991年12月,时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就谴责了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入侵的行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也就此事先后向匈牙利道歉。这也就是说,在匈牙利和苏联,历史都早已还纳吉以公道。那么在如今改革开放的中国,难道不也该还纳吉以清白?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原驻匈牙利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

尹振环

读法家著作《商君书》、《管子》、《韩非子》之后，再读《孙中山选集》，会有一种震撼：真是两重天！不仅可以感受它异常的分量、贵重，还能发现我国系统设计埋葬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方案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赶走了日、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功德盖世！它极大的超出了孙中山设计的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今天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民权主义方面的问题呢？恐怕不能吧。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基本上是郡县制”，“马克思（斯大林）+秦始皇”，如果没有这两条，能否制造出“大跃进”、“文革”那种中外亘古未有的灾难呢？恐怕也不能。这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权主义以根绝帝制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八十二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先生有关设计，当不无启发。

一、首倡“敢有帝制自为之，天下共击之”

黄宗羲、严复他们把秦汉以来的君王称之为“最能欺夺者”、“盗窃之至极”。把君王的法与令十之八九称之为“坏民之财、散民之力、离民之德”。谭嗣同说过：“杀尽世上君王，以谢国人”等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提出了一套理论办法，来废除帝制，让人民自己能够选择自己的“皇帝”和官吏呢？有谁站在芸芸众生的立场上，给他们设计出一整套“治君”、“治吏”办法呢？虽然中国的政治哲学发达得惊人，“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

有。”（鲁迅语）辛亥革命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民国”，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民制约总统、人民制约官吏的书。看来只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个设计了“民国，制定了宪法（临时约法），提出一整套理论办法，来让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使人民能够选择和监督自己的各级领导人。尽管这“民”，还有局限，但毕竟是破天荒的事。虽然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没有成功，但他那一套理论、方法、设计的制度，却是破天荒的事，大放异彩。而且，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品德也是中国里程碑。中国改朝换代的事不少，起义领袖着实的多，可是有几个是为了根除帝制而打天下？又有几个不想黄袍加身、传之万世呢？“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如果得手，而且没有折腰的，或称皇帝、或封侯封王、或升官发财。只有孙中山先生，不想据天下为己有，而是想把天下还之于天下。所以在孙选里不可能看到“尊君卑臣愚黔首”的霉味，也没有孔孟式的“王道”，更没有韩非式的法西斯主义。他的宗旨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他的目的是：把天下变为民有、民享、民治。他只当了几十天总统就辞职了。他的话叫“首先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他在解职之后，信赖袁世凯，国事托袁，他马上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的设计和考虑。映衬了孙先生在政治大污缸中的洁白无私，说明他确实没有任何帝王思想，不懂得诡诈权术，从未感染过帝制病毒。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是真正以“天下为公”的、在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难能可贵的谦逊与不饰非，不断向世界学习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下只注页数),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供学术界研究的需要而出版的”。它好在“原模原样,原汁原味”,连注释都没有。自然没有自己和幕僚们一改再改、遮羞盖蠢。没有隐瞒,没有避讳,没有删节,更没有饰非造伪。初始是什么样的,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尽管开始的认识荒谬可笑,也一老一实原原本本不更改。这才无意间映衬出孙先生的谦逊,和善于不断地修正错误与善于向世界学习。比如《上李鸿章书》有这样的话:“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聆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盛世”、“欢呼”、“鼓舞”,“夫复何所指陈”,这些话实在不太光彩,竟然排在全书之首,孙先生遗嘱中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于孙先生的思想认识来说,来得何等不易。如果从1912年4月10日,他在湖北的欢迎会上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91页)。他又在上海说:“今满清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大纲已达目的……”(92页)。在武昌他说的更明白:“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天下,意见虽偶有参差,而无不同于共和。”今之反对社会革命者,谓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为此言者,真浅见之徒,不足与言治者”(94页)。他不只一次的宣告政治革命已经结束,帝王思想绝迹天下,他以为他所制定的临时宪法(约法),就是民国的基础已大定。所以斥责急于政治的人为浅见之徒,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也并不“深见”。后来他得出另外的结论:“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做到一个真中华民国”(430页)。“去一满洲之专制,转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推翻一个皇帝,出了若干小皇帝”(904页)。前后之言论,不仅何其不同,而且后来见解何等深刻!

又如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也表现出前后之不同,与孙先生不断的修正。

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倘吾国人民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67页)!而他1919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之二,即物质建设部分是用英文写的,这实际上



孙中山

也是“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通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作用……”(338页)。但是没有多久他就修正了他的看法。1924年在《北上宣言》上说:“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殖民地。”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为目的之进行。”因此:“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880页)。“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894页)。尤其是在日本《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更令人感到民族自信、自强、自立的强烈气魄:“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记者认为为救时局,必须有外国之援助才行,问孙先生然否?孙答:“我看不必”(896页)。可见,前后之认识相差甚远,甚至可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正因为如此,才衬托出孙先生的谦虚、善于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谦虚”,重要无比,缺乏不得;尤其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更为重要与难得。缺之必错,必祸国殃民。毛泽东就多次提到孙先生的“谦虚”。

这谦虚还突出的表现在他不断地向世界学习。他的三民主义即是向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的结果。《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看出列宁、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孙先生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较完整地看出孙先生是何等谦虚，何等注意和研究世界的。下面就是他在这两个文件中及这前后的一些文章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要革命成功，必学俄国方法，非采激烈手段不可（422页）。”“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873页）。”

“反对妥协，妥协是过去失败的根源。辛亥革命后，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相妥协”，“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这是失误的根源。

“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要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民生主义之主要原则，民生主义的主要对象是工和农。“农民做基础”（866页）。甚至他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765页）。”

“欲起沉疴”，则“必有主义”，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的政党”（472页）。“国民党要改组，是以苏俄为榜样”（484页）。

“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军。”

“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

“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不等于军阀割据。中央与省采取分权制。省可以立宪，但不能与国宪违背。”

“反对假革命”——即反对那种借革命图私利，来做终南捷径，升官发财（847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不能称之为完全正确。但与过去认识比，岂不是有了某种质的飞跃？它表现了孙先生的“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尽管他是位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认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学习，不断修正错误，方能达到真理的彼岸。错误并不可怕，怕在不认错，怕在不能不断地向世界、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学习。从《孙中山选集》中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然后带个什么帽子，那再容易不过了。如果再搞“预言莫敢违”，非颠倒黑白是非不可。

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孙先生不是生于广东，不是在澳门香港读书就业，不是每一两年周

游一次世界（辛亥革命以前周游六、七次），不可能产生他的政治思想。这与足不出国，不断地研究商、韩，研究二十四史，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列宁1912年7月15日写道：“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忽视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对孙的纲领总的评价是“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58、360页，196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看来列宁是了解孙中山的，他的评价完全正确。

毛泽东称孙先生为“革命的先行者”，这前面没有冠以“资产阶级”的头衔，意味深长。这句朴素的称誉，恰如其分，当之无愧。不过，今天看来，还应该补充一句：“中国建设的先行者”，中国还有谁更早的提出系统的《物质建设建国大纲》这样的蓝图呢？而且比起他的政治建设大纲也毫不逊色。

三、民权主义是铲除皇权专制主义的根本

孙先生的政治思想，“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其核心为“民权主义”重要。新民主主义固然是对旧民主主义的扬弃和补充，但并不是对旧民主主义的否定。正如高楼，并不是对一楼的否定。如果没有民权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保证，那么社会主义将会变成社会皇权专制主义。二十世纪中外已有许多答案了。所以今天的“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的提法，千真万确。

“一国之内，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问题为依归的（75页）。”

“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70页）。”

“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要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79页）。”

“民权主义同谁争？就是人民同皇帝争（667页）。”

“民国之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耳（注意：“‘民国’也）。”

说得何等好啊！所谓“民权”。就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就是言论、新闻、出版、结社的自由，从根本上改变皇帝一人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垄断的专制权力。或者说彻底废除“帝王说了算”的认识垄断、与真理垄断。

孙先生把权与能分开，他说：国民是主人，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是有能的人。就像受雇的驾驶员，有能而无权，汽车的主人有权而无能，车的使用与去向由主人决定，车夫照主人意志开车。人民应该是皇帝，不过像阿斗那样无能。而政府就应该像诸葛亮，鞠躬尽瘁，为人民这个皇帝死而后已。孙先生又将政权与治权分开，所谓治权，就是五大治权——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所谓政权，就是人民用四大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来掌握和影响五大治权。五大治权则行使自己的职权来治理国家与社会。他又说：“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请注意：与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天壤之别！），就是管理政府之权（759页）。他引证一个学人的话：“人民最怕得到一个万能的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秦家店”就是一种万能、全能的政府，不受人民节制）；最想得到一个万能的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他说，人民所欲所怕都是一个万能的政府，四大民权和五权分立正是万能和对万能的节制。同时它还像人们使用机器那样，经常修理国家机器，更新零部件，或者整个淘汰旧机器，用新产品替代它。这就是孙先生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

其次就是他的“五权分立”。集权于一身又无制约机制与不受监督的帝王机制，给中国带来的灾害太多太大，到了近现代更是无法容忍了。所以孙先生参照中外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五权宪法。即在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基础上，将国家的权力分为五部分，或者称为五个院——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这五个院组成政府，对国民大会负责。国民大会由普选产生。不过如报纸、出版、舆论属于什么权，他没有说。因为当时传媒多为民营，官营的极少，自然属于社会。

再次，五权分立的基础是县为自治单位，这

是权力的更大的分散。所谓县的自治，即与人民直接发生关系的县，它的各级官吏和县的国民大会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直接罢免。这样做势必产生颠倒：过去的官吏是唯上是从，总是设法巴结讨好上司，“对上如绵羊，对下赛豺狼”。而直选的官吏，则必得听当地人民的。他们想胡作非为，就不那么顺手了。对于省，起初孙先生主张也实行自治，后来军阀割据的事实使他认识到：一个省的地盘、人口、财力、物力都可以达到自给自立的程度，弄不好就成为变相割据，因此，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规定：“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受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5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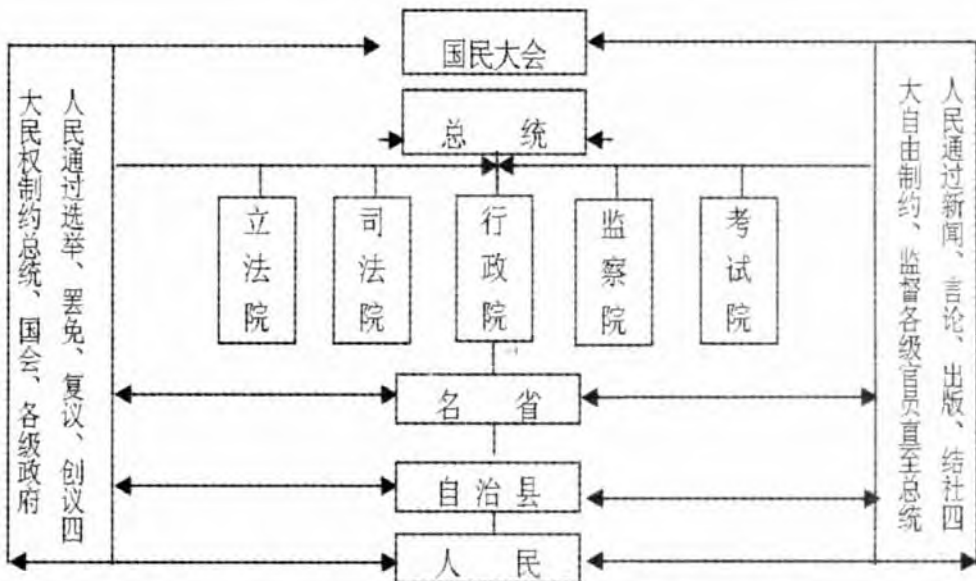
其四，宪法。孙先生的临时约法，不仅是对百姓更是对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袁世凯）的约束。宪法至上，一切得服从宪法。“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宪法是对过去集权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人的否定。而且它将“权力”分开分细，又同时赋给每个公民一定的权力。

如何实行宪政？孙先生设想分三步：第一步，“军政时期”（他又叫“破坏时期”）。进行革命扫除。每一县以三年为限。满三年而成效已达的可以进入第二步：“过渡时期”，即又称约法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建设地方自治，能够民选县长及乡村各级官吏，使县为一个“完全自治团体”。然后“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已达成协议完全自治者”，然后“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国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待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取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151）。这里，国民大会不等于立法院，他说：“国民大会的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而立法院由代议士（代替人民议论国事、国是之“士”、之专家，而不是阿斗，不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之辈）组成。最后进入宪政时期，即“一国之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军事政府解除权柄”，进入“按照宪法，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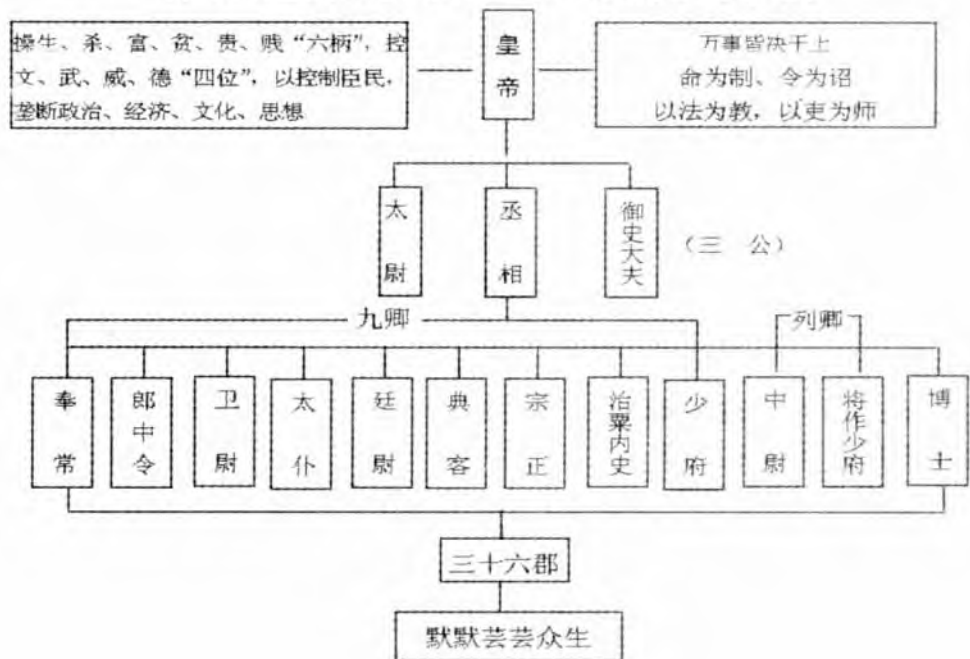
这些设计集中外历史经验之大成，是铲除帝

制、埋葬历代秦家店皇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大策。

如果用一张图表来表示孙先生的政治设计与秦始皇的政治机器与统治方法，那么便如下表：



秦始皇的政权组织与统治方法



可见孙先生的设计是对“秦政制”的彻底否定。今天理当将孙先生称之为“总设计师”。

孙先生还有一些相当精辟的看法：第一，“凡革命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86页)。第二，他说：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要使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

是真民国， 要不然就是假民国”(864页)。第三，他说：“帝国主义与武力相勾结的现象，必使它永远绝迹。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882页)。不过事实证明孙先生所作之估计则太乐观，要“挖

陈土”(打倒封建主义与封建势力)、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他们卵翼下的官僚政客谈何容易。这恐怕远不是三年六年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过分乐观，简直是思想家、革命家的通病。此外，孙先生在政治上也有盲点、重要疏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对中国政治之所以不甚了了，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孙先生周游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自然就看得较明白。所以孙的理论是一个世界性的产物。但是单从山外看还不行，还需要钻进山中去看，这一点恐怕孙先生就欠功夫了：他对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与专制制度还有误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从自由入于专制，人民并没有受过

极大的痛苦(?)。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入于自由”(577页)。

“中国专制时代也有三权宪法”(?)——指君权、考试、弹劾三权(580)。

“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

这真是认识上的大误区，说明他没有详读中

国的法家著作与二十四史。同时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要改组，要以苏俄为榜样”，采取集中制，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还要求党员按手印，绝对服从。为此他与黄兴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为后来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埋下伏笔。这是历史条件使然。当时连陈独秀还不能辨识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正误。何况孙中山？

四、“民国”与“帝国”根本区别在有无“民权”

通过层层任命用人的郡县制，是皇权专制主义“摄制四海，运于掌握”的法宝，它使官吏们唯命是听，绝对服从，绝对忠诚。虽然民怒沸腾，也会“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怒于下而吏畏于上”，皇权专制主义之所以能横行于世，就是靠任命制。如果真要人民“专制”（或谓人民民主专政）的话，真要造就忠于人民的“公仆”的话，非得将任免官吏之权掌握在“人民”手中。舍此绝无它途。“民国”的招牌真假与否，“民国”与“王国”“帝国”的根本区别，全视“人民”是否有选举与罢免之权，其次则是创制和复决权，只有如此才能造就执行人民意志的“公仆”。

但是，事实上选举制也有很大的弊病。人民一时还不可能都具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孙先生说：“无论是选举、无论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因为讷于口才，没人去物色他”。因而在孙先生的政治蓝图中，又有一个专司用人的考试院：“凡候选人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院审定资格者乃可”（570页）。古代的科举，只能造就八股人才，而科举出身的人也只是对上对己负责。而考试院是以普选作基础，是对选举和任命的审查和补充。并且它还有罢免权对考试院的制约。虽然考试院同意，若非其人，尚可罢免之。在普选制、考试制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任命制，正如找到了一个总管、一个工头，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去荐引他所认为合格的人呢？这样一来，连所谓的“世袭制”的合理成分也保留了下来，不过这“世袭”是受普选与考试制约的^注。这一点，可谓

“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孙先生设计是人民掌握主要官吏和主要代表的选择权、罢免权、辅以考试制，而承认以此为前提下的任命制。这些，既是对古郡县制的革命，也是对科举制的改造，还是对世界用人制度的一种综合和创新。当然，孙先生并没有做完，也没有来得及实践，他就与世长辞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真正的普选制，才能使各级官吏“对人民负责，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项政策都对人民负责”。

六十二年前，即1945年9月12日，路透社一位记者向毛泽东提问：“中国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是这样回答的：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67年：《东方红》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书面十二项问题》238页。此文未能入选《毛泽东选集》，不过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就登载有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了中国要实现以上各点）

如果毛泽东后来照他1945年9月说的办，大跃进之灾，文革之浩劫，绝对不会发生，不仅今后这类惨痛教训将永远绝迹于中国，而且孟子感叹的一治一乱、反复不止，也将永远告别中国！

（写成于1977年1月，改于2007年12月）

（责任编辑 吴思）

注 凡产生过的东西，大凡都有它出生的某种根据的。据说，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团，虽然是以普选选出的，但属于中央政府高级官僚出身者就占了四分之一。因为他们先天就占有很多优势：可以利用官方资料，最便于了解全国的状况，在接受现任官吏的合作与帮助方面也特别有利。这使人想起了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还有孙武与孙臆。孙武是将门之后，他是齐景公时伐莒的名将田书之孙。而孙臆则是孙武的后代。史学绝唱《史记》，与《孙子兵法》、《孙臆兵法》都与家学渊源与世袭有关。

清王朝的覆灭及其教训

肖建生 肖羽西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荣辱给当代的中国人留下了许多的教训和启示,其中满清王朝的覆灭给人的教训和启示尤其深刻,值得中国人永远反思。

传统的观点认为,满清王朝的覆灭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人民的过度剥削压榨、人民生活贫困造成的。不能说这些观点不对,但是这些观点太抽象笼统了。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当时的历史,并认真研究历史的细节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看法还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各国对满清政府是采取保护、支持态度的,当时的形势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前完全不同。

其次辛亥革命并不是农民在无法生存的状态下发动的反抗官府的战争,这一点与古代的农民革命也不同,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主要不是经济因素(人民贫穷)引起的,而是一些新军官兵为反对满族统治、追求共和理想发动的,与官逼民反的农民战争是两码事。

第三,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组织有计划发动的,而是一群新军官兵自发发动的,发动时革命力量很弱小,为什么清朝政府不能够及时镇压下去呢?

显然,用传统的观点来解释辛亥革命是说不通的。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王朝覆灭的真相,是满清政府的经济改革没有与政治改革同步推进造成的,这乃是其根本的原因。如果当时的满清政府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及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中国尽快走上民主、共和、法治、自由的道路,保障人权,抑制腐败,化解社会矛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那么,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导致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出现,满清

王朝自然垮不了的。正是因为满清皇族为了一己之私,拒绝放权让利,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君主立宪政体,终于遭到社会下层民众和上层政治人物的普遍唾弃,终致玉石俱焚,与旧王朝同归于尽,谁也不能幸免。

自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满清王朝便失去了一个主动自救的机会。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进攻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俄国占领中国东北1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危机空前加剧,动摇了满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1901年在西安时,慈禧太后就作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是改变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开始与洋人改善关系。第二是发出罪己诏,宣布实行变法,积极举办新政。

关于改善同洋人的关系,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在宫中经常接见外国的大使,接受他们递交的国书,并常常宴请大使的夫人。凡是重大事件,总是先征求外国大使的意见,尽量满足洋人的要求。她甚至恬不知耻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而对西方各国来说,义和团运动之后,也已经意识到,要瓜分和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西方各国从打击满清政府的立场逐步转到扶持满清政府的立场。

满清政府开始从仇恨洋人,转变为依赖洋人,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这是晚清政治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西方各国能够更加有力地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免遭洋人的进一步攻击,减轻了满清政府的外部压力和中国的社会危机。例如当时满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而又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于是通过谈判,使各国同意将中国海关关税进口税率提高

到 12.5%，出口税率提高到 7.5%，从而使关税从咸丰年间的 490 多万两，增加到 1908 年的 3290 多万两，1911 年的 3617 多万两。见《清史稿·食货志六》第 13 册)。这样，赔款中的很大部分就由纳税的外国企业来承担了。另外美国等国家还将赔款的很大部分返还中国，用于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以及资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当时共办了 13 所大学，6000 所中小学，900 所医院。这些都是满清政府缓和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按照国际通行的准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结果。

关于举办新政，开始时基本上还是恢复戊戌维新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裁减一些多余的衙门，设立商务部，奖励民间工商业，举办铁路、矿务，练兵筹饷等等。但是到了后来，改革的力度就增大了，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颁布实行了《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等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使人民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这是中国经济开始走向法治化的标志。如《公司律》第二条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报商部存案。”这就是说，中国人办公司也只需要按照国际惯例那样，只要登记就自动注册了，无须任何人批准。《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将财产所有权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所有为本位，这意味着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此外，满清政府还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给予商会以法律保障的“法人”地位，以保护商人的合法权利。此外在农业、金融、铁路、矿产、交通等领域都颁布了法律法规。

满清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当时市场经济的发育。据统计，从 1895 年到 1911 年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 490 家，其中完全由民商投资的企业 404 家，占企业总数的 82%，资本总额 1.113 亿多元，其中民间商人的投资额达到 8183 万多元，占投资总额的 73.5%。见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这就有力地改变了洋务运动时期官方垄断经济的局面，开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格局。民间商人当时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不仅投资铁路、开矿、冶炼、纺织、轮

船、电力、瓷业、制药、印刷、金融银行等各个领域，甚至还以股份制的形式创办农垦公司，投资现代农业，这标志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在中国诞生，到 1912 年，全国农牧垦殖公司达到 171 家，资本总额达到 635 万多元（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晚清的中国，民间商人掀起了巨大的商业投资浪潮，全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增长速度，从 1895 年到 1911 年，每年平均达到 15% 以上（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 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满清政府也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05 年 9 月，清朝政府派遣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使西洋，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俄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通过亲身考察，五大臣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是拯救中国也是拯救满清皇族的唯一的也是根本的措施，所以，他们坚决要求满清朝廷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取消皇帝专制制度。主要的内容有：一、朝廷宣布立宪宗旨，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祭天誓诰，明定国是；二、中央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三、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官由选举产生，“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四、制定宪法，厘定法律，实现司法权之独立；五、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同时，要求“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1906 年 8 月，慈禧太后根据五大臣的意见，下诏预备立宪。1907 年，又宣布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成立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分钦选、民选两种，共 200 名，其中钦选 100 名，民选 100 名。钦选议员主要是皇室成员和汉族官员，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选举。资政院是一个立法机关，相当于国会的性质。

地方咨议局则相当于地方议会。当时影响最大的地方咨议局，有张謇为首的江苏、浙江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和广东的自治会等。在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建立了政闻社，这是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他们的纲领是要求建立国会制度和责任内阁制度。

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强大舆论和社会潮流。特别是各省的地方自治运动进展很快。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向,民主宪政的政治文化生态开始生成,开始朝着现代文明的方向迈进,从而使严重的社会危机逐渐被化解。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发生革命的社会基础。虽然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沿海地区利用江湖秘密帮会的力量发动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但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满清王朝在短短几年之后就走向灭亡了呢?分析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满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慈禧太后名义上说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立宪的诚意。她在1908年宣布,要在9年后才实行立宪。当时她已经75岁,9年之后他就84岁了,显然,慈禧太后不愿意在她有生之年实行立宪政治。在随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皇帝有颁布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统率海陆军、编定军制、宣布戒严、发布命令等权力。人民自由可以诏令限制。宣战、媾和、订立条约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同时还规定,法律虽经议院议决,但未经皇帝核准,不准实行。凡一切军事,皇帝得以全权执行,国家政务也由皇帝亲裁,议院不得干预。人民只有纳税、当兵、遵守国家法律等义务,不许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更没有其他如选举等公民权利。显然,慈禧太后内心仍然要强化皇权,并没有赋予公民权利的计算。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不足三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由他的生父载沣为摄政王,总揽大权。但载沣也不是一个开明的有作为的人物,并没有在舆论的普遍支持下,迅速改变慈禧太后的政策,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加快君主立宪的步伐,反而以种种理由一再拖延君主立宪的时间。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结果使当时社会潜伏着的3个主要矛盾被激化了。

第一个矛盾,是满汉关系问题。

满清入关之后,虽然极力笼络汉族官员,但



光绪皇帝(中)与康有为(右)、梁启超

骨子里是把汉人当奴才看待的。在鸦片战争之前,满清统治者依靠思想奴役和暴力镇压,能够维持对汉人的压迫,但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后,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危机深重,满人的执政能力遭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质疑,因此,模仿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保持满人名义上的君主地位,让汉人来执政管理国家,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舆论。

可是慈禧太后和后来的载沣不愿意让出政权,迟迟不愿真正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而当时汉族的上层政治人物迫切想参与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满汉上层的种族矛盾终于被激化了。

例如,各省咨议局于1909年10月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发动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请愿活动。12月,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组织 and 发动之下,江苏、浙江、湖南等16个省的议会代表来到上海,经过讨论,决定去北京请愿。1901年1月,他们来到北京,向朝廷递交了请愿书。但摄政王载沣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予以拒绝。

随后,各省代表在北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第二次上书请愿,参加的团体达10个,人数达到30多万,声势空前。但载沣仍以“财政困难为由”再次加以拒绝。10月,资政院开会,国会请愿同志会举行第三次请愿,向资政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在1911年召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载沣面对这种情况,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但各省代表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继续请愿,载沣竟然下令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原籍,并将一些请愿代表发配新疆,使请愿活动遭到失败。

面对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载沣不得已于1911年5月裁掉军机处,组建内阁。可是这个内阁从内阁总理到各部大臣,基本上都是由满清皇族担任,13名阁员中,满族占了9人,分别执掌着总理、财政、军队、人事等重要的职位,汉人仅有4人,而且只掌握些不重要的职位。这充分暴露了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用心。

皇族内阁的成立,举国哗然,使立宪派对满清政府彻底绝望,理想破灭。这些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的汉族政治人物以及工商界等各方面的名人,其政治取向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从反对革命转向支持革命或同情革命。所以,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广东等10多个省的汉族军政首脑以及各界名人,不是支持满清政府镇压起义,而是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满清政府,抛弃满族政权,使满清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而被迫退位。

就是武昌暴动的发生,也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这次暴动是一些新军官兵发动的。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反对满清政府的暴动呢?从根本上来说,是这些具有共和思想的汉族新军官兵,对满人的专制统治十分不满造成的,是汉族军人对满族政权极端反对情绪的总爆发。

军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支柱。满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暴动之前,主要军事力量是八旗军和绿营兵。八旗军和绿营兵实际上是满清皇族的私家军队,并不是国家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的官兵大部分是满族八旗子弟,军队指挥和调动的权力都是由满清皇族掌握。但这些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享有种种特权而慢慢腐化堕落了,根本没有战斗力,在与后来兴起的太平军的战斗中一败涂地。满清政府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下令地方豪绅在地方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于是曾国藩的

湘军便应运而生。此外,李鸿章组织了淮军。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标志着体制内汉族军事强人的崛起。

但满清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充满了猜忌的心理,曾国藩不得已解散了湘军,在随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也所剩无几。这让满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但实权却操在会办大臣袁世凯手中。到190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但身为汉人的袁世凯很快被满族皇室视为心腹大患。1907年,皇室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削去了兵权。改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之后,摄政王载沣不仅不加快军队国家化的步伐,反而妄图回归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的旧轨。他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随即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并任命大量满族子弟出任新军中高级将领。

载沣这一系列强化满族皇室权力、排挤汉族高级军官的举动,激化了汉族官兵与满人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在汉人为主的中下级军官里酿成强烈的不满情绪。本来汉人指望干得好还有希望升上袁世凯这样的高位,现在看来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变得越发不可能。这种对汉族军人的歧视、排斥和防范措施,使许多原来在日本留学时就深受种族革命影响的中下级军官,在前途无望之余越发倾向革命。其中像蒋翊武、孙武等武昌起义的指挥者,对满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是非常强烈的。他们乘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清廷将驻扎于武汉的新军大部调入四川平叛、武汉清军兵力不足之机发动了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时,革命的力量很弱小。满清政府完全可以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加以消灭,可是新上任的满族陆军大臣荫昌发现自

已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清廷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但这时被排挤过的袁世凯对清廷的忠心已经大不如前，已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挽救大清江山的曾国藩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大耍两面手法，最后成为压死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当时袁世凯能够加快宪政改革的步伐，实现军队国家化，大量起用汉族军人担任军事指挥，那么，就不会在汉族军人中产生那么强烈的反满情绪，武昌起义就可能不会爆发，即使发生，也会被北洋军迅速镇压下去。

第二个矛盾，是知识分子问题。

慈禧太后在举办新政、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于1906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使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意味着知识分子通过发愤读书，然后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传统路径被堵死了，从而打碎了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入仕的梦想，这对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方式，而寻求新的通向未来政治前途的道路。

可是，慈禧太后在废除科举考试的同时，却并没有给知识分子开辟一条新的通向参与国家政权的道路。科举废除前（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新式学堂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还有规定：“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毕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同时，对全国小学毕业生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生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生给予举人资格，大学堂毕业生则“候旨赏给”进士头衔。但那时新式学堂很少，学生不多，所以这种“政治待遇”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可是1906年废除科举之后，数以百万计的新式学堂的学生的政治待遇怎么解决？而且每年还有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要求满清政府满足他们进入仕途的要求，但由于名额有限，这种要求怎么能够得到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对满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可以想见的。而且，正是因为名额有限，不可能公开、公平地来分配有限的资源，于是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发生，使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的现象开始泛滥起来，这种官场腐败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满清政府的不满。

在仕途之路受阻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知识

分子对满清政治体制不再留恋。其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思想备受海外同盟会的影响，许多人从日本军校毕业后回国参加了新军，成为新军的中下级军官。还有很多没有能力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寻找出路。这些知识分子满怀着对满清政府的怨恨，很快就接受了反满革命的思想。后来武昌起义就是以这些人为骨干发起的。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为自己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他们最后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科举考试是中国自隋唐开始就实行的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国家政权向民间开放，使大量的民间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他们把皇帝的命令传达到社会的最基层，把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粘合成联系紧密的大一统的板块。因此，科举制度就成为皇帝连接社会底层人民的重要纽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且，科举考试还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制度设计，有相当公正的游戏规则，任何人，只要有知识，都可以通过考试参与国家政权，因而是一种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吏选拔制度。在古代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使中国文明程度成为世界之最。所以，科举制度被西方国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建立的。因此，在国家没有建立更好的官吏选拔制度之前，八股必须废除，但科举制度是不能轻易废除的。

如果满清政府当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迅速在全国建立民主选举的制度，同时保留文官考试制度，使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有政治上的前途和希望，能够有资格参与政治上的平等竞争，那么，这些人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不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而且，如果当时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那么，慈禧太后废除科举制度的决定，就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在国会的争论下，她的这一错误决定就很难在短时间里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政治改革的延后，使专制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地制衡，结果使得慈禧太后的错误决定得以实施，使满清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激化。

第三个矛盾，是私有财产保护问题。

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铁路收

归国有这件事情上。本来慈禧太后在 1901 年宣布举办新政时,就决定向民间开放路权,鼓励民间私人入股修筑铁路。1903 年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24 条,明确规定铁路修筑以民族资本为主,地方政府只有保护之责,而无干预之权。在这一政策的鼓舞下,到 1911 年,全国兴起了 17 家民营的铁路股份公司,投入资本 7000 多万元修筑粤汉等铁路。

但是,到了 1911 年 5 月,满清政府却以商办铁路“延误已久”为借口,宣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收回民间承办铁路的权力。这一违反法律的政策出台,直接引发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铁路风潮,一时间全国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尤其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事件发生后,载沣不但不及时调整政策,反而下令进行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向聚集在总督府门前请愿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成都血案。四川立即爆发了群众武装包围成都的事件。载沣命令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端方,带领湖北新军前往镇压。结果,端方被暴动的群众击毙,清军失败。由于端方将湖北几万装备精良的新军调出,导致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如果这支军队没有被端方调出,那么,武昌起义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很难取胜。可见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对于满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应该说是错误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应该随意改变国家法律有关铁路由民间修建的规定,如果民间铁路公司管理不善,铁路建设存在问题,那么,国家可以成立铁路公司进行铁路建设,国有公司与民营公司可以同时经营,在竞争中使民间公司与国有公司逐步规范起来;二是将民间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政府却不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使民间资本的投资人(股东)遭受重大损失,这是赤裸裸地剥夺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所以群众发起保路运动是正当的。

满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加快了满清政府的灭亡,这是满清政府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如果当时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及时建立起来,民选政府,三权分立与制衡,其政策必须要经过国会批准,那么,铁路国有,而又不给铁路建设中的民间投资人进行合理

补偿的政府决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国会的批准。而且,保路运动发生后,载沣居然下令进行武力镇压,这样的决定,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使专制权力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约,结果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化解,并长期累积下来,最终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而导致矛盾的总爆发,造成社会的崩溃。

满清政府的覆灭,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国家权威的丧失,延缓了中国文明转型的进程。因为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君主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都比较成功,如英国、日本等,而实行总统制都不是很成功,如法国、俄罗斯等。如果当时满清政府坚定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及时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那么,中国就会沿着现代文明的道路发展,并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很不幸的是,满清王朝没有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导致革命的发生,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选择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甚至没有选择美国的总统制,却选择了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可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并不具有权威,既没有权力,更不能世袭,结果,袁世凯还是想恢复君主制,恢复世袭制度和皇帝的权威。但袁世凯做皇帝没有合法性,人民并不认可,结果他只做了 83 天皇帝,就在全国民众的反对声中垮台了。之后,国家陷于了军阀割据混战状态,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作者肖建生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肖羽西为湖南大学国际经济系大四学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正

《炎黄春秋》2008 年第 1 期所刊小文《在上海遥望昆明》一文中,有两处小错:一、第 49 页于再烈士的妹妹于庚梅女士名字应为“于庾梅”;二、第 52 页左栏倒数第 10 行,“主持大会的洪深教授”应为“担任大会司仪的洪深教授”,谨此更正。

袁 鹰

重庆自主新闻发布会： “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

邓 海

11月15日下午3时，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新闻办副主任文天平走上新闻发布台，重庆市自主新闻发布会自此正式登场。35岁的文天平脸有点涨红。发布厅里早已坐得满满的，除了记者，还有外国驻渝领事馆的新闻官。

新闻发布会前23分钟，文天平先作授权发布，澄清了“重庆三峡库区二次移民400万人”的说法，并对解决交通拥堵、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户免税、轻轨老年免费卡等问题做了说明，其中部分是对市民投诉的回应。

随后，问答开始。11个问题，三个来自境外媒体记者。提问热烈，也不乏“刺激性”，现场甚至有性急的记者抢话筒，场面有些火爆。

当地媒体主要问的是一些地方性很强的具体问题，比如油价上涨后政府对长途客车的补贴、生猪非法屠宰、跨区域医保。而中央媒体则毫不客气，家乐福踩踏事故的善后、交通意外如何避免，一个个问题接连抛出，都需要发言人打起全副精神。

最后，一家境外媒体向发言人求证有关“重庆人事变动”的传言，并问文天平对于“民间组织部长”预测准确性的看法。文天平在正面回答之后，不忘幽上一默：“如果真预测这么准，我倒有一个建议，他们与其当民间组织部长，还不如炒股。”

发布会结束后一个多小时，文天平还被记者团团围住，难以脱身。

这个正式确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四举行的发布会，因其“定时、定点、定人、开放式”的特点，被视作国内“一项重要的突破性、填补空白的新制度”，此前仅见于上海市。

媒体可以提任何与主题无关的问题，政府新闻发言人原则上不得以“无可奉告”来搪塞，不会以打招呼、发通稿等形式限制媒体报道发布会内

容——这些事先披露的“亮点”，人们急于在文天平首次亮相时求证。

文天平会后向记者概括其首次亮相的感受时说，“三句话，责任巨大，压力巨大，心态平和”。

另一位确定的新闻发言人是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周波。发布会结束后，他告诉围拢过来的记者，如果满分是100分，文天平今天的表现可以打80分。

有关人士表示，自主新闻发布会除为媒体释疑解惑外，更关注市民所需，强调“民生”色彩。为此，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已建立专用邮箱，及时收集市民和海内外媒体的有关问题和意见，在新闻发布会上予以答复。

据称，有关部门计划在全国推进自主新闻发布会制度，而重庆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尝试，饱含示范意义。

“重庆必须有所突破”

在成为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一举一动更受关注，不久前的农地入股探索，就曾引发热议。

此时推出自主新闻发布会，如果涉及改革试验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应对？舆论的反应是否会影影响改革举措？实际上，在重庆市政府内部也曾对此颇有顾虑。

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对此进行了专项讨论。市长王鸿举表示，不管有多少困难，也不管有多少压力，要建立现代政府都必须迈出这一步，所以，“重庆必须对此有所突破！”

“实事求是基本要求。”文天平说，“开放的社会不仅允许试错，同时也能广泛地汇集信息，让改革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在充分尊重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之下，也才有突破和持续的可能。”

他介绍说，重庆2006年境外媒体采访量仅

为 20 多次,而今年截至目前已超过 80 次。“为弥补记者获得信息不足和保障群众知情权,有必要进行更为广阔的拓展。”

2005 年底,在重庆市,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公民个人隐私和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之外,所有政务信息都必须向市民无偿提供。

2006 年 3 月初,被称为市政府 24 号文的“关于建立健全重庆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制度的意见”公布,明确规定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除了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改革措施等,还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针对外界对我市有关问题的疑虑、误解,需要通过媒体统一对外说明、澄清的情况”。还规定,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由市长指定。

在此次自主新闻发布会推出前,重庆市已有市政府的月度新闻发布会、专题新闻发布会、其他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据统计,2006 年,政府部门举行的各类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周 1.4 场,2007 年截至目前平均每周 4 场,最多时一天就有 3 场。

在月度新闻发布会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以上官员和部门领导经常亮相。文天平说,副省级干部每月发布新闻,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 2006 年开始,重庆市逐步派人到上海、南京等东部城市学习,认为上海的自主新闻发布会不错。文天平总结说,这项制度有三大突破:变单向为互动,变被动为主动,变宣传为营销。“在新闻发布上语言要灵活,少讲枯燥的语言,少说官话,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这位年轻的官员喜欢引用这样一句话——“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中国的改革创新是个不断自我突破的过程,传媒既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也是这个过程中众多推动者之一。”他说。

“人民群众是讲道理的”

重庆看好自主新闻发布制度,而国新办等有关部门正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此项工作,两相呼应,重庆很快就由申请转入筹备。实际上,重庆的自主新闻发布,2006 年就开始有所尝试。

2006 年初,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副局长李

福多在家中切腹自杀,此事随即引发轰动;种种猜测此起彼伏。在对此事的报道上,重庆放开手脚,不再要求媒体发新闻通稿。大足县政府的反应速度很快,事发次日上午,县政府新闻发言人便就此事对外发言并接受记者采访。而随着公安机关调查的逐步深入,发言人几乎每天都要向媒体公布最新调查进展。

这种做法取得的效果不错,谣言相继消解。县政府新闻发言人后来回忆说,由于民众掌握的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实,难免以讹传讹,而政府公开、规范地发布信息,有助于释疑解惑。

2007 年 5 月,重庆市江北区发生了开发商强拆居民楼的事情,包括公安在内的多个部门迅速出动,对强行拆迁者进行了控制。江北区政府也在当天通过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事件详情和处理意见。

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事件处理顺利,开发商后来也被送上了被告席。

江北区在总结时表示,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如果政府传播信息及时,危机是很快能够得到解决的,“人民群众是讲道理的”。

不过,要及时透明地传播信息,制度保证是必要的。文天平认为,重庆设立的自主新闻发布制度就是有力保障。

为确保发言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重庆市破例允许发言人列席市政府常务会。市长、副市长主持召开的重要专题会议和工作会议,甚至市长的重要工作调研考察,发言人都可以参加。此外,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也将转由新闻发言人来承担。

“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不负责任”

承诺不说无可奉告,众目睽睽之下答不上来提问怎么办?文天平向记者解释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民生,主要的对象是人民群众,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是不负责任的。”

至于一些“技巧”,他认为“没有必要”。“对人民我们有什么可隐瞒的?玩弄花招,群众不喜欢!”

民生色彩是重庆自主新闻发布会的突出特

色。事实上,此前的月度新闻发布会上,既能看到城乡总体规划、节约型机关建设、教育事业发展等宏大话题,也有稳定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等民生主题。

今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周慕冰称,重庆将在危化品运输车辆和加油站强制推行阻隔防爆技术,市民在加油站内可打手机的日子,为期不远。

这次向社会公布新闻发布邮箱后,每天都能收到数十条群众发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反思。比如说,有下岗工人称创业没有享受到法定优惠,去了解情况后才发现是他没有申报,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对政策的宣传还不到位。”

(转自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11月25日)

言论获罪版本不断刷新,值得反思

叶祝颐

山东省高唐县民政局干部董伟因在网上发帖称“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被指诽谤县委书记孙兰雨,几天以后,即2007年1月1日,他因涉嫌侮辱罪被送进高唐县看守所,同时被关的还有王子峰、扈东臣。出乎意料的是,1月21日,撤销逮捕,他们被释放了。他们被当地电视台报道为“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因为言论获罪已经算不上新闻了。重庆彭水县秦中飞用手机编发了一首有关时事的打油诗,结果换来了牢狱之灾。安徽五河县一中的两名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的校长任命考核,编发手机短信给有关领导,遭遇降级、撤职处分,还被拘留、罚款。

因为言论获罪的悲剧一再上演,笔者不禁想问,百姓说话到底犯了哪门子王法?惹得领导如此恼火呢?这不是压制言论、封堵民意吗?真是岂有此理!不让百姓说话,拘留敢说话的人,不仅没有任何民主可言,而且会加深百姓对权力层的怀疑和对立。百姓毕竟不是围着磨盘转圈的驴。

那么,董伟发帖的内容到底算不算诽谤姑且不论,即使真的“诽谤”了县委书记也应该是民事纠纷、自诉案件,由县委书记起诉他们,而不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拘留、逮捕等方式来追究刑事责任。

其实,如果官员工作做好了,根本不用担心百姓来“诽谤”。反之,如果贪污腐败、工作失职、“打肿脸充胖子”上面子工程,即使滥用权力去堵百姓的嘴,总有被舆论口水淹没的那一天。

讽喻社会现实的网络言论、短信、民谣之类,并非空穴来风,往往多被百姓言中了。安徽贪官王怀忠出事前,当地就流传“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的民谣。王怀忠垮台以后,民间又流传“腐败坏种(怀忠)没跑掉,迟早抓住王昭耀”的民谣。权倾一时的王怀忠、王昭耀,不是在百姓的“诽谤”中倒台了吗?沸沸扬扬的彭水诗案,县委书记不是被撤职了吗?

(原载2007年12月21日《羊城晚报》)

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

杨 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重要手段。我国近30年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向持积极、慎重、有序的态度。表现在具体方式上,即是广泛的基层试点。据悉,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所有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公推直选等,均在(县)市)或以下进行过试点。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我国政改的发力点逐渐上移。如对党内民主,中央在建立起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

度后,十七大又进一步规定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扩大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范围,且媒体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这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呈现“上下呼应”的新态势。

对政改的另一个促进,在于保持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十六大以来,对政治建设的讨论更加充分,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表达和争论。对此,党的决策层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王贵秀教授认为,这对发展政治民主,促进社

会和谐有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专家普遍指出,随着十七大报告所说“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的制度化、规范化和贯彻落实,自由宽松、民主讨论的环境定将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专家们注意到,十七大前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将“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作为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摘自《瞭望》2007年第51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俐 王一心	29.80	6.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杨继绳	36.00	7.00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唐筱菊 陈少铭	38.50	7.00
1949年后的梁漱溟	汪东林	23.00	5.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定西孤儿院记事	杨显惠	25.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罗平汉	32.00	7.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密(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普洱茶健康之道	周红杰	39.80	7.00
松针养生革命	董看看	39.80	7.00
陈松梅花集	陈 松	38.00	7.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读 者 来 信 摘 登

贵刊 2007 年第 12 期发表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 8 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我查阅了《辞海》1981 年 10 月第一版历史分册以及其他一些资料，证明唐肃宗时期并没有发生引文所载的有名的“八司马事件”。《辞海》上指明：公元 805 年唐顺宗李诵在位的时候，在京城长安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的领军人物是“二王”，即王叔文、王伾，“八司马”依次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 8 人。这 10 位有名的人物一致筹划和支持唐顺宗倡导的政治改革，大刀阔斧地做了许多有利国计民生的好事。例如：减免了一些捐税，停止、取消了宫市和地方官员必须给皇帝进奉，减低了盐价，释放了不少宫女，废除老百姓积欠官府的一部分租税，特别是惩治了一些大贪官污吏，限制约束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等。这些改革和变更，触犯了许多权贵们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改革，直至给唐顺宗施加压力，逼迫唐顺宗把皇位禅让给皇太子李纯。李纯即位，这就是唐宪宗皇帝。此后，权贵们进一步专权施虐，先后杀死了王叔文、王伾，并将韩泰等 8 人全部撤职，贬到荒凉边远的地方去当叫做“司马”的卑官，因有“八司马”之称。由此可见王叔文并不在八司马之列。唐肃宗当皇帝比顺宗早 49 年。

由唐顺宗倡导的这次改革变法，由于保守反动势力强大，仅仅持续 146 天，即告失败。历史上因它发生在唐代永贞年间，所以也称为“永贞革

新”。永贞革新的失败，加速了唐王朝走向灭亡的进程。

陕西读者 宫时中

贵刊重视对刊物文中错误进行更正，实为对读者负责的表现。现提出两点供参考。

1、2007 年第 10 期《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51 页)：“马识途(时名马千禾)正在(昆明)南萍街上逛书店，进来了两个美国士兵。”

“萍”字误，应为“屏”。这是当年昆明市中心最热闹的短街，附近有“南屏电影院”，有很多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小店，还有一两家卖英文书的小店，穷学生多去翻阅或“拣宝”。

2、2007 年第 2 期《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9 页)：“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饮冰室文集》为梁启超先生的文集。在“宋教仁”前应加上“梁启超”的名字。有书名前面无作者名，读者易生误会，或张冠李戴。

广东读者 孙红晔

贵刊 2007 年第 8 期《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一文中：“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前……”有错，应为“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前……”云南大学前身叫东陆大学。东陆大学是民国时期唐继尧创办，唐是云南省会泽县人，因称唐会泽，故云大主楼便取名“会泽院”。

这里我想补充“大跃进”时，有关会泽院铁大门的一个可笑的故事：

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旁的铜大炮虽然在“大跃进”时不幸被人拆毁火化，但主楼数米高×数米宽的西式雕花图案的大铁门，却免遭“杀身

之祸”，幸运地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为什么？故事颇具戏剧性，一时传为美谈。

一天，某单位一位干部带领一千人马，手拿工具来到云南大学，声称要拆除主楼大铁门去炼钢。被当年云大的总务处长（长征老红军）喝止。那位干部很是“理直气壮”地说：中央有文件，要是谁阻挠，不许拆除，就是违抗大炼钢铁，违抗大跃进，违抗中央的指示。总务处长呵斥道：炼钢铁，我们自己不会炼？何须你多事，你是什么单位的，你是几级干部，你看什么中央文件？我倒是看到中央最近发来的一个文件说，近来有人借大炼钢铁为名，到处乱拆国家保护的物质材料、文物等等，胡作非为，如有发现要严肃处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看来有点像，先把你扣留在这里，通知你单位派人把你领回去处置。

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大铁门被保护下来了。

广东读者 宁业祯

我是《炎黄春秋》的一名老读者，从2003年开始订阅，每月4日就盼着《炎黄春秋》早一天来到。收到当天我就通读一遍，然后再细读，对重点文章详细作摘录，名曰《炎黄摘华》。这一份《炎黄春秋》经常有八位老同志争相传阅。他们都说：“《炎黄春秋》是敢说真话的刊物，说出了老百姓想说不敢说也不会说的心里话。”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了解了不少历史真相，解开了很多疑惑，看到了不少“今董狐”，增强了对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的希望，使我们晚年心情更加舒畅。

我们八个老读者对《炎黄春秋》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另外有时有个别错字，请注意，如2007年第11期第60页“是否有”误为“有否有”。

山东读者 王锡忠

2007年5月以来，有幸读到了我所能找到的《炎黄春秋》。拜读之余深有相见恨晚之意。心情可谓又兴奋又沉痛，兴奋的是看到了好多历史的真实、尘封的金子、膜拜了一些我们民族的脊梁；沉痛的是20世纪炎黄子孙所遭的“人祸”磨难，真是2006年第12期第42页所说令人“撕心裂肺颤栗不已”。好在沉重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民族的振兴，尘封的金子，该闪光的还得闪光，切肤之痛，痛定还得思痛。而这些正是我“天天读”《炎黄春秋》的原因。

下面以自身经历为贵刊2006年第12期《四首佚名诗非梁漱溟所作》写点参考。上世纪70年代，“四人帮”垮台后，我有幸参加了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书法展览，也有一首《咏“臭老九”》，只是个别字句略有不同。书法作品写的是：“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其犹人，而今老九不如狗。革命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若叫马恩生今世，一样揪去满街游。”展出年月已记不清楚，作者姓名也未记下。

云南读者 王嘉煜

看到你刊2007年12期刊登的《故园长吟将军颂》（作者孙奇）后，给我的印象极好。反映了原中央领导吴学谦、王兆国到沈阳、以及辽宁省委领导为迎接张将军回归故里的准备，这不仅代表中央有关领导、省委领导对张将军回归的关怀，更代表了我們东北人民的心声！这件事大得人心！但这件事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是一件憾事！

该文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参加庆祝张学良百岁华诞活动的人中有杨虎城长子杨拯民。（53页右栏6行）杨拯民同志已于1998年10月23日与世长辞了。给张将军祝寿是2000年6月2日。这件事肯定有误，或是笔误，或是提供材料的同志搞错了！希望你刊调查后，刊登更正。

北京读者 白竟凡

孙奇回复：

我文中的说法有误。白竟凡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谨致以谢意。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2007年12期刊登的我写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说：林克“在香港不幸逝世”（8页右栏6行）。此说不确，林克是在北京逝世的。特此更正，并向林克同志的家属致歉。

容全堂

欢迎订阅2008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

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

现代民主的两面观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

清王朝的覆灭及其教训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